記黑石號(Batu Hitam)沉船中的中國陶瓷器

謝 明 良*

【摘要】本文主要是擬考察 1998 年於印尼勿里洞島(Belitung Island)海域發現被命名爲黑石號(Batu Hitam)的唐代沉船中之陶瓷器，兼及該沉船可能的航路。由黑石號沉船所打撈上岸的中國陶瓷器計約六萬餘件，作品主要燒製於九世紀的湖南長沙窯、浙江越窯、河北邢窯和廣東窯系等瓷窯。除此之外，沉船還發現了三件可能來自河南鞏縣窯的所謂唐青花瓷以及近兩百件的白釉綠彩鉛釉陶器。後者白釉綠彩陶器的產地學界見解分歧，本文則是推論其可能是來自河北地區瓷窯場所生產，同時不排除是來自著名的邢窯窯場所燒製。從黑石號沉船出土陶瓷的組合以及中國以外地區的考古標本並考慮到當時的航運路線，本文認爲黑石號沉船可能是於揚州解纜出港，其最終目的地是波斯灣著名的東洋貿易港尸羅夫(Siraf)。

關鍵詞：黑石號　唐代陶瓷　揚州　長沙窯　越窯　鞏縣窯

一、前言

1998 年，距離印尼勿里洞島(Belitung Island)海岸不及兩哩，深度約僅十七公尺的海底偶然發現大量成堆的陶瓷等遺物。初勘結果，確認是屬於沉船遺留。由於該沉船推測可能是因撞及西北 150 公尺處的一塊黑色大礁岩而失事沉沒，因此參與勘查工作的人員遂將之命名為黑石號(Batu Hitam)。黑石號沉船的探勘打撈作業始於 1998 年 9 月，之後曾因西北季風一度中斷工作，翌年 4 月重新開工，同年 6 月基本竣工。

從黑石號沉船遺骸打撈上岸的遺物種類和數量極為豐富，就其質材而言，至少包括有金、銀、銅、鐵、鉛、骨、木、石、玻璃和各類的香料以及陶瓷器等，而除了植物香料和玻璃等遺物之外，絕大多數的文物均來自中國所製造生產。其中，以陶瓷器的數量最為驚人，估計有六萬七千餘件。依據目前所累積的中國陶瓷史研究成果，人們已可輕易地判明沉船陶瓷主要是屬於公元九世紀的作品。儘管有部分瓷窯作品的產地仍待研究，但多數陶瓷應是來自湖南省長沙窯、浙江省越窯、河北省邢窯和廣東窯系等瓷窯窯場所燒製。

* 國立台灣大學藝術史研究所 教授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企圖為文總合考察這數量龐大，種類又頗多樣的沉船陶瓷，極易流於浮光掠影，而若欲針對單一專題進行探討既有太多的遺珠之憾，不免又有以偏概全之嫌。因此，本文即將採行的做法是擬在綜合觀察沉船中可確切判明瓷窯產地之各窯系作品的基礎之上，擇要概括、省思其在中國陶瓷研究史上的意義。其次，再針對白釉綠彩這類相對罕見，同時產地仍有爭議的作品進行考察。

二、沉船年代的釐定及其對晚唐陶瓷編年的啟示

就陶瓷史的領域而言，數十年來唐代考古的主要成果包括了窯址的發掘和墓葬的清理工作。窯址標本的樣式特徵，可做為判斷其他遺址出土陶瓷產地的基本依據，而紀年墓葬所出陶瓷無疑也為各遺址同類標本的定年提供了重要的線索。依據窯址和墓葬發掘資料並結合部分本身即帶有紀年銘文的瓷窯作品，其實很容易掌握黑石號沉船大多數陶瓷的大致產區及其相對年代。

黑石號沉船陶瓷以湖南長沙窯的數量佔絕大多數，其次，另有來自浙江的越窯青瓷、北方的白瓷、嶺南的青瓷和所謂的白釉綠彩陶等各類作品。嶺南廣東窯系的青瓷當中，以一類胎骨厚重，整體施罩綠青色調透明開片亮厚釉的作品最為精良，所見器式除了少數壺罐類之外(圖 1)，以百餘件的呈敞口、斜弧壁的圈足或璧足碗的數量居多(圖 2a、b)。另外，也有於內壁施以耐火泥團墊燒而成的粗質青釉寰底缽等作品(圖 3)。圈足碗口沿切割成四花口，花口以下器身外壁飾凹槽，內壁對稱處有出戟，滿釉，底有三處團狀支燒痕；璧足碗亦施滿釉，僅於足上留下三塊狀墊燒時的澀胎，頗具特色(圖 4)。從廣東梅縣唐墓屢次出現該類青瓷碗[1]，同時梅縣水車公社等窯址也出土了造型特徵完全一致的標本(圖 5)[2]，可以認為沉船中的該類施罩透明亮厚青綠釉的作品，是來自唐代梅縣窯區所生產。此一事實既可再度補強廣東瓷窯作品是唐代外銷瓷的商品內容之一[3]，同時也和東北亞日本基本不見廣東陶瓷而以越窯青瓷、長沙

---

[1] 廣東省博物館(古運泉)，〈廣東梅縣古墓葬和古窯址調查發掘簡報〉，《考古》1987 年 3 期，頁 211 圖 5 之一；廣東省博物館等，《廣東出土晉至唐文物》(香港：香港中文大學文物館，1985)，頁 220 所載畬坑 3 號墓出土品。

[2] 曾廣億，〈梅縣古窯址調查簡記〉，原載廣東《文博通訊》1978 年 3 期，收入：廣東省博物館編，《廣東文物考古資料選輯》1(1989)，頁 193-195 轉頁 188。

[3] 何翠媚，(土橋理子譯)，〈唐代末期における廣東省の窯業および陶磁貿易について〉，《貿易陶磁研究》12(1992)，頁 159-18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窯和北方白瓷為主要的陶瓷輸入組合，形成鮮明的對比④。

沉船數百件的白瓷窯口不止一處，但顯然是以百餘件的河北內丘、臨城地區的著名邢窯系作品最為精良。器形包括注子(圖 6)、碗(圖 7、8)、杯(圖 9)、杯托(圖 10)等不一而足。其中，淺身弧腹碗和斜弧壁碗的底足亦多呈璧形，前者見於臨城大中十年(856 年)劉府君墓，⑤而前後兩種碗式也可在廣州大中十二年(858 年)姚潭墓尋得類似的作例(圖 11)⑥。雖然，部分邢窯白瓷璧足碗的作風極難與做為定窯前身的唐代曲陽窯同式作品予以明確地區別⑦，不過我們確實可在臨城、內丘等邢窯窯址中得見不少與沉船陶瓷完全一致的白瓷標本(圖 12)⑧，因此有相對充分的理由將沉船該類細白瓷歸入邢窯系統。結合窯址發掘層位和紀年墓資料⑨和其約為晚唐九世紀時期作品。

數以萬計的沉船所出長沙窯以直口弧腹淺身碗的數量最多。該類碗多於內壁釉下描繪褐綠相間的各種圖紋，間可見到以氧化鐵書寫漢字詩文或題記作品(圖 13)。無論何者，多採取沾釉的方式於口沿內外兩側裝飾出對稱的四處略呈半圓形的釉上大褐斑，東京國立博物館藏釉下褐書「開成三年」(838 年)紀年銘文的長沙窯碗即具備相同的裝飾作風(圖 14)⑩。褐斑是長沙窯流行的加飾技法之一，碗類之外，常見的還有帶把注壺，其係於器肩置多棱短流，對側設把，流和把之間飾模印貼花，待施掛青黃色釉之後再於流、把和貼花部位以沾浸的

---

④ 龜井明德，〈貿易陶磁史研究の課題〉，《日本貿易陶磁史の研究》(京都：同朋社，1986)，頁 4。

⑤ 李振奇等，〈河北臨城七座唐墓〉，《文物》1990 年 5 期，頁 22 圖 2 之 5、6。

⑥ 廣州市文化局文化事業管理科(黃流沙等)，〈舉辦《廣州市一年來生產建設中出土古文物展覽》的經驗和體會〉，《文物參考資料》1954 年 8 期，頁 96 圖 25。其屬邢窯作品一事，已由陳萬里所指出。參見：廣州市文物管理委員會，〈三年來廣州市古墓葬的清理和發現〉，《文物參考資料》1956 年 5 期，頁 27。

⑦ 葉喆民，〈邢窯芻議〉，《文物》1981 年 9 期，頁 50。

⑧ 河北臨城邢瓷研制小組（楊文山等），〈唐代邢窯遺址調查報告〉，《文物》1981 年 9 期，頁 41 圖 4-6。

⑨ 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等），〈河北省內丘縣邢窯調查簡報〉，《文物》1987 年 9 期，圖版貳之 7。

⑩ 東京國立博物館編，《東京國立博物館圖版目錄》中國陶磁篇 I(東京：東京美術，1988)，頁 79 圖 30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手法裝飾團扇形褐色斑塊(圖 15)。該類注壺是沉船陶瓷當中數量僅次於長沙窯碗的器式之一；江蘇鎮江唐太和八年(834 年)鄭夫人墓所出注壺亦屬此類⑪。其次，鎮江元和十五年(820 年)□府君墓出土的帶草葉紋樣彩飾的斂口肩圓形小盂⑫，或鎮江寶曆二年(826 年)殷府君墓出土的喇叭式口點彩小注壺等長沙窯瓷⑬，也見於黑石號沉船中(圖 16)。不僅如此，沉船所見撇口淺腹碟，碟心和外壁下部，留下方形露胎，作風較為特殊(圖 17)，但長沙窯蘭家坡窯址既曾出土該類標本，同時長沙大(太)和六年(832 年)王清墓亦見同類瓷碟，從而可知沉船該式碟的確切窯口和大體上的年代 。⑭

此外，總數近兩百件的沉船越窯青瓷亦存在部分可與紀年墓標本相互比較而得知其大致年代的作品。如沉船所見敞口斜直壁璧足碗(圖 18)即和安徽開成五年(840 年)墓越窯系碗造型一致⑮，而沉船中倣金銀器式的委角盤(圖 19)亦見於浙江紹興大中五年(851 年)越窯製品⑯。不僅如此，委角盤內壁的陰刻劃花紋飾也和現藏上海博物館的大中元年(847 年)自銘注壺紋飾大體相類⑰。此外，河南偃師會昌五年(845 年)李存墓出土推測來自越窯的青釉唾壺之造型也和黑石號沉船同類作品極為類似(圖 20) 。⑱

經由以上紀年墓資料與黑石號沉船所見可判明產地之瓷窯作品的比較，可以初步得出結論認為，沉船多數陶瓷的年代均集中在九世紀前中期。值得一提

---

⑪ 鎮江博物館(劉建國)，〈江蘇鎮江唐墓〉，《考古》1985 年 2 期，頁 133 圖 4 之 15。

⑫ 鎮江博物館(劉建國)，同上註，圖版參之 5。

⑬ 鎮江博物館(劉建國)，同上註，圖版肆之 6。

⑭ 周世榮，〈略談長沙唐王清墓與出土瓷器的窯口問題〉，《考古》1985 年 7 期，頁 620 圖 3 之 2。

⑮ 合肥市文管處(程如峰)，〈合肥市發現明代瓷器窖藏和唐代邢窯瓷〉，《文物》1978 年 8 期，頁 53 圖 4。朱伯謙，《越窯》中國陶瓷全集 4 (京都：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美乃美，1981)，頁 176。

⑯ 張德懋，〈餘姚發現唐大中四年瓷壺上有銘款 43 字〉，《文物參考資料》1957 年 6 期，頁 92。該報告並未提及出土有委角盤出土，本文是從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林士民)，〈浙江寧波和義路遺址發掘報告〉，《東方博物》1 (1997)，頁 244 的敘述間接得知。

⑰ 陳萬里，《中國青瓷史略》(上海：人民出版社，1956)，圖 10。

⑱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徐殿魁等)，〈河南偃師杏園村的兩座唐墓〉，《考古》1984 年 10 期，頁 911 圖 9 之 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是，沉船文物分類、整理的幕後最大功臣，海德堡大學陳玉秀女士，更於數萬件的陶瓷中發現了一件器外壁在入窯燒造之前陰刻「寶曆二年七月十六日」銘記的長沙窯釉下彩繪碗(圖 21)，而與該紀年銘碗形制相同的長沙窯彩繪瓷碗於沈船中達數萬件之多。因此，如果我們相信，瓷器從燒成至販售之間不致於相距太久，則黑石號沉船的絕對年代就有可能是在晚唐寶曆二年(826 年)或之後不久。無獨有偶，沉船長沙窯彩繪碗當中另有一件於碗內壁正中繪掛鐘圖形，其左右兩側繪飾帶桿旗幟，其中一旗面圓形開光內書「丙」字，另一旗面開光中則書「了」字(圖 22)。由於前述寶曆二年紀年正是丙子年，因此不由得會讓人懷疑「丙了」或為「丙子」之訛？

無論如何，沉船年代的初步釐定，使得我們有理由依恃船中的大量陶瓷進而結合目前所見紀年墓資料，回頭檢証過去學界對於唐代陶瓷的編年成果或推論，甚至釐清以往未能解決的若干疑點。以長沙窯瓷的彩飾變遷而言，過去馮先銘曾經指出其斑點裝飾是由九世紀初的大塊褐斑演變至揚州解少卿墓所見的褐綠小斑點⑲。從湖北武昌貞元二十年(820 年)墓⑳、湖南長沙大和六年(832 年)墓㉑，以及九世紀前期黑石號沉船均見此類團扇形大褐斑，同時沉船長沙窯作品又未見明顯的聯珠式褐綠小斑點裝飾等情形看來，八十年代初期馮氏的推論應該說是極為恰當的。其次，就紀年墓資料而言，裝飾有褐綠聯珠式小斑點的長沙窯作品目前見於江蘇無錫咸通八年(867 年)皇甫雲卿墓㉒和前引揚州解少卿墓中的雙繫罐。依據墓誌的記載得知，後者解氏墓為夫婦合葬墓，解氏卒於大和九年(835 年)，其妻蔡氏歿於大中四年(850 年)，因此墓中所見雙繫罐既有可能是蔡氏卒歿後合葬時所攜入，也不排除是埋葬解氏時的隨葬品。從雙繫罐造型和點彩裝飾和咸通八年(867 年)皇甫雲卿墓作品頗為接近一事看來，解氏夫婦墓中的點彩罐有較大可能是大中四年(850 年)合葬時所埋入。換言之，紀年墓資料表明長沙窯褐綠聯珠式小斑點的年代不能早於九世紀三十年代，並且晚至九世紀六十年代仍持續地生產。就此而言，長谷部樂爾認為長沙

⑲ 馮先銘，〈三十年來我國陶瓷考古的收獲〉，《故宮博物院院刊》1980 年 1 期，頁 14-15。

⑳ 全錦雲，〈武昌唐墓所見銅官窯瓷器及其相關問題〉，《考古》1986 年 12 期，頁 1128 圖一之 23。

㉑ 周世榮，同註(14)，頁 621 圖五之 1。

㉒ 無錫市博物館，〈江蘇無錫發現唐墓〉，《文物資料叢刊》6 (1982)，頁 125 圖 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窯的釉下彩繪是由聯珠式斑點點描圖形演變而來看法[23]，以及其門生今井敦近年所主張長沙窯點描圖形的作品，是介於褐斑點彩裝飾和釉下彩繪之間的過渡發展樣式之說法[24]，恐怕與事實不符。從黑石號沉船包括寶曆二年(826 年)紀年作品在內的數萬件長沙窯碗多繪飾有釉下彩繪圖紋看來，長沙窯釉下彩繪的起始年代顯然要早於聯珠式點描技法。其次，長沙窯窯址出土的書寫有紀年銘文的作品則又表明，釉下彩繪裝飾持續至大中年間(847-859 年)仍然頗為流行。[25]

黑石號沉船長沙窯釉下彩繪碗的圖樣內容種類極為豐富，包括有各式植物花卉圖形(圖 23、24)和雲紋(圖 25)、鳳紋(圖 26)、鳥紋(圖 27)摩羯魚紋(圖 28)，和卷髮人物紋(圖 29)以及採用減筆方式潦草地描繪花草般的圖案等等。儘管題材頗為多樣，但碗的造型特徵則大體一致，並且均於碗口沿部位加飾四只大褐斑，該一現象可以說明繪飾內容各異的同器式碗的年代應大致相當。過去三上次男曾經提出一個饒富趣味的說法，認為長沙窯釉下彩繪中的一類繪飾有形似花草的圖紋，其實是由鳥紋簡化而來，而長沙窯的鳥紋則又是受到波斯陶器鳥紋飾的影響[26]。姑且不論三上氏所列舉的裝飾有鳥紋的伊朗東北部陶器作品的年代是否確實早於長沙窯鳥紋碗？也暫不論同氏所謂的抽象簡化鳥紋之觀看擺置方向，即圖形上下天地的判斷是否正確？就黑石號沉船資料而言，以上兩類圖紋是共伴出現，並且也看不出兩者有任何的時代差距或圖形演變關連。因此，三上氏以及其他繼承或發展該一說法的論述[27]，恐怕也有修正的必要。

學界對於備受晚唐文人歌頌讚揚的越窯青瓷仍存在不少難解的課題和爭議。其中，爭議的焦點之一是越窯青瓷刻劃花紋飾的出現或成熟、流行的年代。

---

[23] 長谷部樂爾，〈唐代陶磁史素描〉，收入：《唐磁》(東京：根津美術館，1988)，頁 14。

[24] 今井敦，〈中晩唐の中國陶磁〉，《東京國立博物館紀要》31 (1996)，頁 33。

[25] 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蕭湘)，〈唐代長沙銅官窯址調查〉，《考古學報》1980 年 1 期，圖版參之 9、10 大中九年(855 年)銘彩繪注壺；圖版玖之 10 大中十年(856 年)銘彩繪鼓腹。

[26] 三上次男，〈イラン發見の長沙銅官窯瓷と越州窯青磁〉，《東洋陶磁》4 (1974-1977)，頁 8。

[27] 如佐佐木達夫即繼承並發展了該一說法。參見同氏，〈バンボ—ル出土の中國陶磁と海上貿易〉，收入：田邊勝美等編，《深井晉司博士追悼シルクロ—ド美術論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頁 231-23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人認為晚唐劃花紋飾作品只是罕見的特例[28]，也有的以浙江寧波出土越窯為例，主張劃花紋飾均出現於大中二年(861 年)以後，但盛行於五代至北宋初期[29]。之所以會出現這樣分岐的見解，其主要原因是帶有明確紀年的晚唐時期越窯劃花作品極為少見，故學者們只能援引上海博物館藏大中元年(847 年)越窯青瓷劃花注壺等少數作品進行揣測[30]。另一方面，近年公佈的浙江和義路遺址所出大量越窯劃花青瓷，則進一步地將紀年遺物結合出土層位予以分期。依據報告書的敘述，唐代貞元年間(785-805 年)已經出現少量的劃花紋碗(唐代第三文化層)；元和年間(806-820 年)前後既見陰紋或陽紋印花裝飾，也存在有少量的劃花標本(唐代第二文化層)；而大中年間(847-859 年)則普遍出現陰刻劃花作品(唐代第一文化層)[31]。就黑石號沉船越窯劃花青瓷而言，其於內壁陰刻花葉，外壁飾四道凹槽的撇口圈足碗(圖 30)見於元和年間唐代第二文化層的 II 式碗，同時沉船唾壺和整體略呈粗短頸玉壺春狀的配置有多棱注口的帶把壺(圖 31)也見於同一層位當中。結合該層位亦伴出有與沉船類似的長沙窯貼花褐斑飾注壺(XI 式壺)，可以認為報告書對於該層位的年代釐定是頗為恰當的。不過，如果我們相信黑石號沉船的越窯青瓷是來自同一時段的作品，那麼和義路之大中年間唐代第一文化層出土的帶紐蓋盒(VII 式罐)或委角四方碟(I 式盤)等作品之造型或劃花技法既然和沉船同類遺物極為接近(圖 32 及同圖 19)，故不排除該一層位或許包括部分時代理應較早的遺物在內？當然，同一器式或類似的圖紋也有可能沿續一段時期，但此均還有待今後詳細的編年來解決。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沉船越窯劃花青瓷既有僅刻劃疏朗圖紋者(圖 33)，也有於器面滿飾圖紋的作品(同圖 30)，此則又說明了兩類劃花樣式有一段重疊並存的時期[32]。綜觀沉船越窯青瓷不難發現，除了劃花作品之外，另存在有無加飾的素面作品(圖 34)，越窯作坊的這種兩路貨生產形態可說是同省宋元時期龍泉窯燒

---

[28] 龜井明德，〈唐代玉璧高台の出現と消滅時期の考察〉，《貿易陶磁研究》13 (1993)，頁 104。

[29] 馮先銘，同註(19)，頁 6。

[30] 陳萬里，同註(17)，圖 10。該作品口部已殘，修復後的清楚圖版可參見：汪慶正編，《越窯、秘色瓷》(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6)，圖 12。

[31] 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林士民)，同註(16)，頁 243-280。

[32] 近年，森達也亦曾指出兩類作品的並存現象。參見同氏，〈晚唐期越州窯青磁の劃花文について〉，收入：《楢崎彰一先生古稀記念論文集》(京都：真陽社，1998)，頁 48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製兩路類型青瓷的先驅[33]。雖然，黑石號沉船的越窯素面青瓷檔次不一，但卻包括了部分釉呈青綠色調極為精美、尺寸又大的作品在內。著名的陝西扶風咸通十五年(874 年)法門寺越窯秘色瓷即是承襲了這一路的燒製傳統所取得的傑出成就[34]。從法門寺地宮秘色瓷中的素面折沿平底盆之盆式(圖 35)，亦見於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功臣墓[35]、洛陽後梁開平三年(909 年)高繼蟾墓[36]，或近年發現的臨安後晉天福四年(939 年)吳越國恭穆皇后康陵[37]，可知該路傳承至少還沿續至五代時期。因此，以往有學者或許是因著重觀察素面青瓷的發展變遷，從而主張晚唐時期越窯劃花青瓷只是罕見特例的看法，無疑是有修正的必要。越窯劃花有時還與鏤空裝飾結合運用(圖 36)，而劃花作品與素面瓷並存的現象於沉船所出蓋盒亦可見到。所見蓋盒有多種樣式，有的於蓋面飾刻劃花，也有的僅於蓋面正中上方置傘狀紐(同圖 32)後者造型與河北省太平興國三年(977 年)靜志寺塔基所出同類作品極為類似[38]，故不排除靜志寺塔基之原定為北宋時期越窯青瓷蓋盒的年代可能上溯至九世紀。

紋飾之外，黑石號沉船越窯青瓷的器式亦提供了該窯作品造型變遷的有趣線索和啟示。舉例而言，若就沉船所見一式口徑近三十公分的折沿帶繫圈足盆的繫耳裝飾和圈足裝置看來(圖 37)，其和寧波和義路唐代大中年間第一文化層(II 式盆)(圖 38)[39]，以及臨安第 20 號、21 號五代錢氏墓出土的越窯同式青瓷盆似乎存在著演變的關係[40]，即盆之身腹是隨著時代而加深，器腹弧度趨小，

---

[33] 任世龍，〈龍泉青瓷的類型與分期試論〉，《中國考古學會第三次年會論文集 1981》(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121-127。

[34] 陝西省法門寺考古隊(韓偉等)，〈扶風法門寺塔唐代地宮發掘簡報〉，《文物》1988 年 10 期，頁 1-26。

[35]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姚仲沅)，〈浙江臨安板橋的五代墓〉，《文物》1975 年 8 期，頁 71 圖 5 之 2。

[36] 洛陽文物工作隊(朱亮等)，〈洛陽後梁高繼蟾墓發掘簡報〉，《文物》1995 年 8 期，頁 54 圖 3 之 11 及彩圖 2。

[37] 杭州市文物考古所(張玉蘭)，〈浙江臨安五代吳越國康陵發掘簡報〉，《文物》2000 年 2 期，頁 22 圖 34。

[38] 出光美術館編，《地下宮殿の遺寶》(東京：出光美術館，1997)，圖 81。

[39] 寧波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林士民)，同註(16)，頁 262 圖 11 之 12。

[40] 浙江省文物管理委員會，〈杭州、臨安五代墓中的天文圖和秘色瓷〉，《考古》1975 年 3 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至五代時期更於略呈斜直壁的盆腹下方置大口徑的高圈足。另一方面，如果我們將觀察的重點置於做為帶繫圈足盆主體造型的折沿盆上，則可得出完全不同的結論。也就是說，黑石號沈船帶繫折沿圈足盆之身腹明顯又要比前述咸通十五年(874 年)法門寺出土的折沿平底盆來得深。這就提示我們越窯青瓷不同器式之間的演進過程並不一致，故上述對於帶繫圈足盆的近於機械式的觀察顯然還有商榷的餘地。不過，我們似可依據浙江紹興元和五年(810 年)王叔文夫人墓的越窯青瓷多棱形注口帶把壺(圖 39)之壺式而輕易得知[41]，時代相對略晚的沉船同式壺的壺頸收斂較劇，但壺身和注口則趨修長(同圖 31)。越窯青瓷的編年並非本文主要的討論重點，不過，我至少有義務指出河南三門峽市唐代張弘慶墓越窯青瓷的曖昧且不恰當的定年，這是因為該墓出土越窯作品的年代涉及到學界要如何地評估、掌握八世紀中期陸羽《茶經》所載如冰似玉越窯青瓷的確實面貌這一青瓷史上的重大議題，不能等閑視之。按張弘慶墓雖伴出有墓誌，可惜誌文漫漶只知其卒歿於□□四年，但發現者則依據墓室結構及隨葬品內容、型制，認為該墓所出器身飾刻劃花的越窯青瓷穿帶壺(圖 40)是介於同地區天寶元年(742 年)韓忠節墓和偃師元和九年(814 年)鄭紹方墓之間的作品[42]。姑且不論其劃花紋飾所呈現出的晚唐裝飾特徵，由於與該壺造型基本一致的越窯劃花穿帶壺亦見於黑石號沉船(圖 41)，故張弘慶墓的這件被視為盛唐期越瓷重要例証之相對年代，也應在晚唐九世紀時期，這從同墓伴隨出土的另一件具有典型晚唐造型樣式的越窯青瓷壁足敞口碗亦可窺見得知。其次，若將沉船年代結合墓誌「□□四年」的記載，則墓主張弘慶極有可能是終歿於長慶四年(824 年)，即沉船寶曆二年(826 年)長沙窯紀年銘瓷的前二年。就此而言，目前的考古發掘仍然未能尋覓符合《茶經》所記述的類玉、類冰般之八世紀中期越窯青瓷；相對的，施罩精純青釉的越窯製品均集中於九世紀，故《茶經》中有關瓷窯品評的記載是否確為陸羽所書？值得深思。

黑石號沉船所見穿帶壺除了越窯青瓷之外，還包括產地待進一步確認的白釉綠彩鉛釉陶(圖 42-a、b)和河北邢窯系白瓷作品(圖 43)。該一現象表明，九

圖版玖之 2。

[41] 陳萬里，《瓷器與浙江》(北京：中華書局，1946)，頁 13；圖參見：故宮博物院編，《故宮博物院藏瓷選集》(北京：文物出版社，1962)，圖 7。

[42] 三門峽市文物工作隊(寧景通)，〈三門峽市兩座唐墓發掘簡報〉，《華夏考古》1989 年 3 期，頁 97-112 轉頁 81。許天申，〈試論河南出土的越窯瓷器〉，《江西文物》1991 年 4 期，頁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世紀前期穿帶壺式已是各地瓷窯流行的器式之一，因此過去論者以為穿帶壺是十世紀之特異樣式的說法[43]，也應予以修正。此外，沉船的邢窯系白瓷當中亦見俗稱「萬年壺」的豐肩鼓腹蓋罐(圖 44)，個別作品另於器肩加置管狀短流(圖 45)。前者和陝西省博物館藏邢窯白瓷造型、釉色基本一致[44]，後者帶流罐相對少見，但陝西省長安縣南里王村 132 號唐墓曾出土類似造型的白瓷作品[45]。儘管該類罐是盛唐八世紀時期白瓷或三彩釉陶常見的器式之一，而河南偃師會昌五年(845 年)李存墓[46]或同省鞏義市大中五年(851 年)薛府君墓亦見同類白瓷作品(圖 46)[47]，可惜缺乏九世紀前期的紀年遺物得以啣接。故年代相對明確的沉船該類罐可以彌補其中的缺環。

三、白釉綠彩陶器和青花瓷器

黑石號沉船當中計有總數近兩百件的白釉綠彩陶和為數僅三件的青花瓷。白釉綠彩陶之器胎燒結程度不一，多數作品胎質略顯粗鬆呈灰白或偏紅色調，但部分作品瓷化程度較高近似所謂的[illegible]器(圖 47)。除了少數作品於白釉上施加綠、黃等兩種釉彩之外，多數作品均於器胎施掛白化妝土而後罩以低溫透明釉，釉上再加飾綠彩斑紋或以淡綠色釉遍塗器身(圖 48)，後者就外觀而言，亦可稱為綠釉陶。此外，沉船亦存在少數僅施掛低溫鉛綠釉的作品(圖 49)，其施釉工序和相對濃綠的釉調雖與白釉綠彩陶不同，但兩者於器形或裝燒工藝等方面則頗有共通之處，有可能是來自同一窯區所生產，因此以下將一併進行討論。

沉船白釉綠彩陶器形種類包括有帶把注壺、穿帶壺、蓋罐(圖 50)、蓋盒(圖 51-a、b、c)、盂(圖 52)、盤(圖 53)、碗(圖 54)、缽(圖 55)、盆(圖 56-a、b)和三足盂(圖 57-a、b)等，有的器類還可再區分為若干式，造型頗為多樣，幾乎網羅了目前考古所見晚唐白釉綠彩陶的常見器式，甚至存在部分以往所未知

---

[43] 矢部良明，〈遼の領域から出土した陶磁の展開〉，《東洋陶磁》2 (1973-1974)，頁 25。

[44] 畢南海，〈西北華東五省市隋唐白瓷考察紀實(一)〉，《河北陶瓷》1988 年 3 期，頁 12 圖 5。

[45] [illegible]安志，〈陝西長安縣南里王村與咸陽飛機廠出土大量隋唐珍貴文物〉，《考古與文物》1993 年 6 期，頁 48 圖二之 3。

[46]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徐殿魁等)，同註(18)，頁 907 圖 5 之 3。

[47]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趙清等)，〈鞏義市北窯灣漢晉唐代五代墓葬〉，《考古學報》1996 年 3 期，圖版拾陸之 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器形。其次，沉船白釉綠彩陶的裝飾亦有可觀之處，除了模印貼花之外，還有陰刻劃花或貼塑等較為罕見的裝飾手法。為了避免敘述上的枯燥繁瑣，本文不擬逐一介紹沉船中的這類鉛釉陶器，但至少有必要參酌中國遺址出土的可資相互比對的標本，首先再次檢証沉船同類作品的可能所屬時代，進而擇要說明沉船所出部分罕見的器式和裝飾題材。

就目前中國的考古資料看來，帶把注壺是白釉綠彩等陶瓷相對常見的器形之一，故可提供判斷沉船同式注壺年代的參考依據。沉船帶流注壺計有二式，I式是於器肩一側置上斂下豐的管形短流，肩另側頸肩之間設泥條雙股式弧形把，整體施罩綠釉(同圖 49)；II 式白釉綠彩注壺的壺身和呈喇叭式的頸部造型雖和 I 式注壺一致，但係於壺口和壺肩處置獅形把，注流呈龍首狀，且於器肩把和注之間安雙股式半環形縱繫(圖 58-a、b)。與 I 式壺造型一致的白釉綠彩注壺曾見於河南安陽薛家莊唐墓(圖 59)[48]，後者注壺雖亦被定年於五代時期[49]，不過從該墓伴出有具九世紀造型特徵的白瓷璧足碗，同時與碗配套使用的花瓣卷沿白瓷托盤也和河北臨城大中十年(856 年)劉府君墓出土品造型一致[50]，所以我認為原墓葬發掘報告書的定年才是正確的。其次，前引劉府君墓或山西貞元八年(792 年)宋嘉進墓[51]，也分別出土了與沉船 I 式壺造型類似的白瓷和黃釉注壺(圖 60)。另一方面，經正式公佈的中國考古發掘資料雖未能見到和沉船 II 式獅把龍首流壺同型制的白釉綠彩作品，但可確認數例同為獅形把，但注流不加飾龍首的壺身造型與 II 式壺相近之白瓷注壺，其中一件出土於河北定窯窯址晚唐堆積層[52]，西安白鹿原第 14 號唐墓亦見該式白瓷壺(圖 61)[53]。後者墓葬雖乏明確紀年，但從共伴出土的黑釉雙繫罐與同墓群中的貞

---

[48] 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劉東亞)，〈河南安陽薛家莊殷代遺址、墓葬和唐墓發掘簡報〉，《考古通訊》1958 年 8 期，圖版壹之 8 右。

[49] 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孫新民等)，〈介紹幾件陶瓷精品〉，《華夏考古》1996 年 3 期，頁 109；《河南出土陶瓷》(香港：香港大學美術博物館，1997)，圖 24。

[50] 李振奇等，同註(5)，頁 22 圖 2 之 5、6。

[51] 長治市博物館（侯艮枝），〈長治市西郊唐代李度、宋嘉進墓〉，《文物》1989 年 6 期，頁 48 圖 11。

[52] 河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隊(林洪)，〈河北曲陽縣澗磁村定窯遺址調查與試掘〉，《考古》1965 年 8 期，圖版伍之 5。

[53] 俞偉超，〈西安白鹿原墓葬發掘報告〉，《考古學報》1956 年 3 期，圖版柒之 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元十七年(801 年)李良墓同式罐形制相近[54]，推測其相對年代可能是在九世紀前期，而該一年代跨度也和沉船越窯、長沙窯等作品所顯示的時代不謀而合。此外，沈船所見綠釉三足鎮鍰，鍰蓋置寶珠形鈕(同圖 57)，其造型、釉色特徵也和河南偃師元和九年(814 年)鄭紹方墓出土作品一致。[55]

除了中國北方地區墓葬或遺址之外，晚唐時期的白釉綠彩陶以江南揚州的出土數量最多，標本的造型和裝飾也和沉船同類作品最為相似，如七十年代發掘揚州唐城遺址所獲四花口圈足碟(圖 62)就與沉船作品造型一致(圖 63)[56]。其次，沉船白釉黃、綠彩四花口碗當中包括一式於花口下方外壁飾凹槽，內壁相對處起棱，同時又在碗心貼飾模印陽紋趕珠龍之洋溢著金屬器皿要素的華麗作品(圖 64)，也曾出土於揚州唐代遺跡(圖 65)。特別是近年揚州唐代建築基址發掘出土的敞口折沿白釉綠彩大盆(圖 66)[57]，或造型較為特殊呈敞口寬平折沿式樣的白釉綠斑點飾大盤(圖 67)[58]，其器式也和沉船同類作品相符(同圖 56 及圖 68a、b)。應予一提的是，揚州該建築基址另伴出了九世紀前期的越窯青瓷劃花四方碟等作品，此亦再次說明了該類白釉綠彩陶的大體年代。另外，沈船所見白釉綠彩多採用支釘支撐正燒的技法，故如折沿大盆盆心留有三只對稱的細小支燒痕，有趣的是該盆外底，還可見到三只形支燒窯具的痕跡(圖 56)。

相對於揚州出土白釉綠彩陶的器式大都能在沉船同類作品中得以見到，沉船的白釉綠彩陶則包括不少揚州未曾出土的器形和裝飾內容。在裝飾方面，沉船所見與前述揚州唐城四花口碟造型相同的作品，既有另於碟心陰刻花葉、雲

---

[54] 俞偉超，同上註，圖版捌之 9。

[55]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院，《偃師杏園唐墓》(北京：科學出版社，2001)，頁 198 圖 190 之 7 及彩版 16 之 5，黑白圖版 23 之 2。不過黑白圖版和彩版說明將該作品誤植為 M0954 號墓出土。本文依據原墓葬發掘報告書(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隊，《考古》1986 年 5 期，頁 449 圖 33 之 2)及此次新刊的報告集，頁 196 的敘述內容判斷綠釉三足鍰應是出自 M2544 號墓，即鄭紹方墓。

[56] 南京博物院發掘工作組等，〈揚州唐城遺址 1975 年考古工作簡報〉，《文物》1977 年 9 期，頁 26 圖 26。

[57]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揚州城考古隊等(王勤金)，〈江蘇揚州市文化宮唐代建築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4 年 5 期，圖版柒之 1、3。

[58] 弓場紀知，〈揚州－サマラ－晚唐の釉陶器、白磁青花に關する一試考－〉，《出光美術館研究紀要》3 (1997)，頁 88 圖 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紋和蝴蝶等組合紋樣(同圖 53)，也有的是在碟內面陰刻複線菱形邊框，框內飾幾何紋飾，外框四邊角加飾花葉(圖 69-a、b)，而這類菱形花葉紋樣也同樣出現在沉船的另一件敞口寬平沿白釉綠彩大盤(同圖 68-b)。就目前中國境內出土的中晚唐時期鉛釉陶器的裝飾技法而言，以模印貼花或陽紋印花較為常見，至於在器表陰刻紋樣的作品則極為少見，經正式報導的考古實例，除了陝西耀州窯窯址出土標本之外，[59]大約只有安徽巢湖會昌二年(842 年)伍府君墓的綠釉殘片[60]，以及山東益都或揚州等地出土的三彩魚形穿帶壺等少數作品了[61]。然而黑石號沉船卻存在多件飾陰刻劃花的白釉綠彩陶，並且重覆出現於菱形邊框四角刻劃朵花這種與中國傳統紋樣大異其趣的構圖。從前引沉船一件直徑近 39 公分，器體碩大的蓋盒盒面正中菱形輪廓線邊角飾蓮花，並有朵雲紋陪襯一事可知，菱形花葉紋飾本身在細部上是有多種的變形，似乎也可任意地與其他單位紋樣進行組合(同圖 51-c)。最引人注目的以菱形花葉為主要紋飾的白釉綠彩陶，無疑是一件通高逾一公尺的超大型把壺。把壺主體是由狀似膽瓶的長頸和球圓腹所構成，頸上置外敞的瓣口，正中兩側微內凹形成前方的注口，腹底扁圓算珠形飾下方置喇叭式高足，口沿和肩部安斷面呈品字形的泥條三股式把，上端一股泥條頂端飾蛇首，張嘴吐舌朝向壺口(圖 70-a、b)。另外，沉船亦發現一件綠釉帶榫龍首(圖 71-a)，龍首尺寸與插榫大體可與把壺的瓣口扣合，(圖 71-b)但是否確實屬於該把壺壺蓋部件？還難遽下斷言。無論如何，在線刻紋飾襯托之下，使得該巨型把壺愈顯華麗，其既於瓣口和壺肩飾雲頭紋，頸下方部位和高足分別刻劃仰覆蓮瓣，足上方扁圓珠上飾唐草紋，但最為突出的則是上下方以弦紋區隔出的壺身腹正中部位的菱形花葉紋樣，其不僅於把手下方和壺身兩側刻劃這類菱形花葉，餘下空間更以上下弦紋為邊界滿飾由菱形正中剖開的三角形花葉紋，致使整體畫面繽紛中帶著秩序感。菱形花葉紋飾是白釉綠彩陶作坊工匠有意凸顯的圖紋一事，還可在沉船中的廣口、卷沿、豐肩綠釉罐得以窺見得知(圖 72-a、b)。按該綠釉大罐上的綠釉幾乎斑剝殆盡，且因受水浸泡，器表呈暗褐色調，但從個別部位殘留的綠釉，同時考慮到罐的器形與同沉船的白釉綠彩蓋罐(同圖 50)一致等推測，該大罐原先可能亦施白釉綠彩，並且配置

---

[59]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唐代黃堡窯址》(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彩版 5 之 3。

[60] 巢湖地區文物管理所(張宏明)，〈安徽巢湖市唐代磚室墓〉，《考古》1988 年 6 期，頁 525。

[61] 謝明良，〈從揚州唐城遺址出土的三彩魚形壺談起〉，《故宮文物月刊》10 卷 10 期(1993)，頁 82-9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寶珠鈕蓋。該罐罐身兩側飾菱形花葉紋，其間夾飾龍紋，龍首造型和前述疑為把壺壺蓋的綠釉龍頭帶榫構件一致，而龍背頸和龍口前方的寶珠形飾物也見於揚州出土的白釉綠彩四花口碗碗心模印貼飾上的龍紋。我不厭其煩地強調白釉綠彩上的菱形花葉飾，是因為該類構圖於中國工藝品上極少見到，然而卻是波斯陶器常見的裝飾圖紋(圖 73)[62]。不僅如此，為數有限的裝飾有菱形花葉紋的中國工藝品的年代亦多集中於九世紀，其包括了湖南長沙窯作品上的彩繪(圖 74)[63]和同省郴州市唐墓出土的滑石盒蓋刻飾[64]，以及揚州出土的唐代青花瓷上的鈷藍彩飾(圖 75)[65]。過去馮先銘曾提示，揚州唐代青花瓷上的該類圖紋或有可能是波斯人在揚州所繪製[66]，雖然我們無從檢驗馮氏該一突發奇想的論點是否正確？但此一洋溢著異國趣味的構圖無疑應予留意。特別是黑石號沉船所見的三件青花瓷也均是以菱形花葉紋做為裝飾的母題，若結合長沙窯和白釉綠彩陶的貿易瓷性質，似乎透露了該類圖紋主要是和外銷的工藝品有關。就此而言，前述白釉綠彩把壺把手上方的蛇首雕飾或許也是出於類似的考慮？但卷沿大罐菱形花葉和龍紋的組合布局則又說明了中國傳統圖紋與新興紋樣的融合。

事實上，著名的伊拉克薩馬拉(Samarra)遺址即出土了在盤心刻劃菱形花葉紋飾的寬平沿白釉綠彩大盤(圖 76)[67]。薩馬拉是阿拔斯朝(Abbasid)伊斯蘭教教主(Al-Mu'tasim)在西元 836 年於巴格達(Baghdad)北方一百餘公里底格里斯河畔所建立的都城，該遺址至十世紀末期仍未完全廢棄，但主要是繁榮於建都以來至繼任教主(Al-Mu'tamid)在西元 883 年遷都回巴格達為止的近五十年間。遺址於本世紀初由德國考古隊進行了科學的發掘，出土了數量龐大的波斯陶器和中國陶瓷，後者除了有越窯青瓷、邢窯系白瓷等之外，另包括部分低溫鉛釉系統的三彩印花紋陶、綠釉陶和白釉綠彩陶等標本。儘管波斯釉陶和中國釉陶殘片

---

[62] Arthur Lane, *Early Islamic Pottery,* London、Faber & Faber 1947、Pl. 8A

[63] 馮先銘，〈從兩次調查長沙銅官窯所得到的幾點收獲〉，《文物》1960 年 3 期，頁 31 圖 2。周世榮，《長沙窯瓷繪藝術》(上海：人民美術出版社，1994)，圖 90。

[64] 雷子干，〈湖南郴州市竹葉沖唐墓〉，《考古》2000 年 5 期，頁 95 圖 2 之 1。

[65] 南京博物院發掘工作組等，同註(56)，圖版貳之一。

[66] 馮先銘，〈有關青花瓷器起源的幾個問題〉，《文物》1980 年 4 期，頁 7。

[67] Friedrich Sarre（佐佐木達夫譯），*Die Keramik Von Samarra*（サマラ陶器），(3)，《金[illegible]大學考古學紀要》23 (1996)，頁 243，圖版 XXVII 之 4。我在此要感謝佐佐木氏的辛勞，將這一重要的報告書譯成日文。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有時不易明確區分，但報告者則經由胎釉外觀的仔細比較，大致成功地將兩者予於區隔，特別是被歸入中國製品的一件綠釉殘片上更墨書庫非克(Cufic)體「SIN」，即意味「中國」的銘文；白釉綠彩陶則見到可能是表示器種的阿拉伯文墨書[68]。就我所掌握的資料看來，學界除了對遺址所出少數作品持有異議之外，一般都接受、承襲報告書對於陶瓷的產地歸類。也就是說，學界一方面都同意包括薩馬拉或揚州在內遺址出土的白釉綠彩陶是來自中國所生產，但對於前述薩馬拉遺址出土的口沿造型前所未見，且裝飾刻劃著菱形花葉紋樣的白釉綠彩大盤的產地，若非不置可否，即認為是屬於波斯陶器[69]，關於這點，我相對幸運地能從黑石號沉船的近兩百件標本之器形和胎釉的相互比較，深具信心地認為，數十年前薩馬拉遺址的發掘者兼報告書執筆者 Sarre 將該刻劃有菱形花葉紋樣的白釉綠彩盤視為中國製品的判斷是正確無誤的。然而，問題是包括刻劃花紋作品在內的白釉綠彩陶瓷究竟是中國何處窯場所生產？自 Sarre 中國製品說之後，大致上還有河南說[70]、河南鞏縣或陝西耀州說[71]、河南或湖南長沙說[72]、河南或陝西且不排除南方窯說[73]，以及鞏縣窯說等等見解[74]，當中又以河南鞏縣窯的說法最為常見。我能深切體會上述各種論說的形成原委，也大致理解各持論者對於作品的相異觀察重點和可能的顧慮，但由於鞏縣窯的持論者擁有標本胎釉的科學分析數據，故相對普遍為人們所接受，因此，本文只想以鞏縣窯說法為例，進行必要的檢証。

主張揚州、薩馬拉等地遺址白釉綠彩陶是來自鞏縣窯的學者，主要是基於以下幾點認知。即鞏縣窯是經確認的燒製盛唐三彩最重要的窯場之一，鞏縣盛

---

[68] Friedrich Sarre（佐佐木達夫譯），同上引書，《金沢大學考古學紀要》24（1998），頁230。

[69] 弓場紀知，同註(58)，頁94-95。

[70] 三上次男，〈東南アシアにおける晩唐、五代時代の陶磁貿易〉，收入同氏《貿易陶磁研究》上(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社，1987)，頁341。

[71] 佐佐木達夫，同註(67)對薩馬拉遺址出土綠釉陶(C類)和白釉綠彩、黃彩陶(G類)的譯注。

[72] 何翠媚，(佐佐木達夫等譯)，〈9-10世紀の東・東南アジアにおける西アジア陶器の意義〉，《貿易陶瓷研究》14 (1994)，頁38。

[73] 弓場紀知，同註(58)，頁 102。另外，江蘇方面的研究者也認為揚州出土的綠釉或白釉綠彩陶可能是揚州或附近地區所燒造。此說參見，鄒厚本主編，《江蘇考古五十年》(南京出版社，2000)，頁381。

[74] 中國社會科學考古研究所揚州城考古隊等(王勤金)，同註(57)，頁41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唐三彩器不僅曾於揚州出土，甚至外銷至日本等地。其次，揚州地區白釉綠彩陶瓷經常和晚唐白瓷共伴出土，而後者經胎釉成分分析証實是來自鞏縣窯。更重要的是，薩馬拉等地遺址的白釉綠彩陶亦經化驗，其胎釉成分也表明極可能是鞏縣窯所製造生產的。但我認為事實恐怕未必如此地單純。

首先，S.J. Fleming 等人運用中子活化分析(INAA)測定了唐三彩標本和來自薩馬拉以及伊朗尸羅夫(Siraf)等地遺址的波斯釉陶，認為唐三彩高鋁低鐵的胎土表明係中國北方所產；而通過與鞏縣窯標本數據的比較，認為經化驗的三彩標本很可能來自鞏縣[75]。由於該測定報告的主要論旨之一，是試圖闡明薩馬拉和尸羅夫遺址所出中國製白釉綠彩等鉛釉陶與波斯釉陶的關聯，致使人們容易毫不猶豫的以為白釉綠彩陶之胎土與鞏縣製品的緊密連繫。不過，該測試取樣的中國鉛釉陶標本卻是出土地點不明的盛唐八世紀時期三彩人俑，而後者胎土成分是否近似鞏縣窯作品一事，其實和薩馬拉等地出土的九世紀白釉綠彩陶的產地毫不相干。故上述測試數據及其推論方式既乏正面意義，甚至有誤導之嫌。相對之下，由 Jessica Rawson 等人所進行的標本胎釉分析則顯得嚴謹。羅森等人以 SEM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檢測了來自埃及福斯塔特(Fustat)、斯力蘭卡曼泰(Mantai)和薩馬拉遺址的白釉綠彩陶，首先區別出中國和波斯陶兩群，進而再以中子活化和統計學組群分析技術將高鋁胎的中國群細分成三組，其中 A、B 二組可能來自鞏縣窯，C 組產地不明；曼泰遺址兩件標本分屬 A、C 二組，而福斯塔特和薩馬拉遺址的白釉綠彩陶則可歸入 A 組。[76]應留意的是，做為判別產地的比對數據樣本，則是包括鞏縣盛唐三彩、晚唐白瓷和陝西出土的鉛釉陶，唯獨欠缺窯址出土的晚唐白釉綠彩標本，故其測試結果雖則提示了高鋁胎的白釉綠彩陶具備了中國北方陶土的特徵，與鞏縣窯標本較為接近，但對於該類白釉綠彩陶是否確實來自鞏縣所產？恐怕還不宜輕下結論。事實上，高鋁胎是中國北方陶瓷的特徵一事可說是陶瓷學界的常識，也因此鞏縣白瓷的胎釉和同屬北方地區窯場的邢窯白瓷成分極為接近。[77]

我認為，在缺乏窯址出土標本可資比對的現實條件之下，黑石號沉船所提

---

[75] S.J. Fleming（方崚譯），〈一種與穆斯林西方相互影響的唐代多彩制品〉，收入：李家治等編，《古陶瓷科學技術 2 國際討論會論文集 CISAC》(1992)，頁 167-176。

[76] Jessica Rawson, The Export of Tang Sancai Wares: Some Recent Research, *Transaction of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52, 1987-88, pp. 39-61。

[77] 李國楨等，《中國名瓷工藝基礎》(上海：上海科學技術出版社，1988)，頁 10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供的豐富樣本，或許有助於我們能從作品本身的外觀觀察並結合中國的考古發掘資料，著手進行間接的產地釐測。截至目前，經公布的燒造有多彩鉛釉陶的唐代窯址，計有河南鞏縣窯[78]、洛陽[79]和陝西耀州窯[80]、西安西郊機場、[81]河北邢窯等窯場[82]。但從目前的發掘報告看來，上述窯址均未發現與沉船白釉綠彩陶相同的標本，不過包括沉船在內的白釉綠彩陶之部分作品造型，則與邢窯窯址出土的白瓷標本或流傳於世被視為邢窯系的白瓷器有共通之處。如前引黑石號沉船的獅把龍首流注壺造型(同圖 58)就和弗利美術館(The Freer Gallery of Art)[83] 或台灣私人藏的邢窯系作品基本一致(圖 77)[84]。其次，邢窯內丘窯址中唐時期的深腹斂口碗(圖 78)、卷口碗之器形亦見於沉船白釉綠彩陶(圖 79)[85]。此外，沉船的直口弧壁璧足碗之器式不僅和邢窯窯址標本頗為近似[86]，同時其璧足外牆邊沿斜削一周形成棱面，內牆沿[illegible]削銳利，足著地處留下數處[illegible]修時的不規則刀痕等之底足成形技法也和邢窯系白瓷璧足常見的外觀特徵基本一致(圖 80)。特別值得一提的是，沉船中的一件以支釘支燒的綠釉裹足花口碗)(圖 81-a)，外底心釉下刻有「盈」字銘記(圖 81-b、c)。眾所周知，目前所知刻有「盈」字的作品分別出土於陝西唐代青龍寺址[87]、西明寺址[88]、大明宮址[89]和

---

[78] 劉建洲，〈鞏縣唐三彩窯址調查〉，《中原文物》1981 年 3 期，頁 16-22；孫新民等，《鞏義黃冶唐三彩》(鄭州：大象出版社，2002)頁 80 等。

[79] 洛陽市文物工作隊(俞涼[illegible])，〈河南洛陽市瀍河東岸唐代瓷窯址發掘簡報〉，《考古》1998 年 3 期，頁 23-32。另外，[illegible]陽茹[illegible]亦發現若干三彩標本，報告參見：鄭州市文物工作隊(陳立信)，〈河南[illegible]陽茹[illegible]發現唐代瓷窯址〉，《考古》1991 年 7 期，頁 664-666。

[80] 陝西省考古研究所，同註(59)，上冊，第二章第一節參照。

[81] 西安西郊機場極可能亦存在三彩窯址，惜窯址已經毀壞，詳情不明。採集標本可參見：張國柱等，〈西安發現唐三彩窯址〉，《文博》1999 年 3 期，頁 49-57。

[82] 內丘縣文物保管所，同註(9)，頁 1-10。

[83] 佐藤雅彥等編，《東洋陶磁》(東京：講談社，1980)，卷 10，フリーア美術館，圖版 8。

[84] 國立歷史博物館編輯委員會，《中國八代陶瓷精品展》(台北：國立歷史博物館，1987)，頁 27。

[85] 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等)，同註(9)，頁 7 圖 12 之 1、2。及河北臨城邢瓷研制小組(楊文山等)，同註(8)，頁 41 圖 6。

[86] 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等)，同註(9)，頁 7 圖 12 之 5。

[87] 西安市文物保護考古研究所(翟春玲等)，〈青龍寺遺址出土“盈”字款珍貴白瓷器〉，《考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河北易縣咸通五年(864 年)孫少矩墓[90]，所見作品均屬白瓷，由於其胎釉特徵與邢窯作品一致，同時邢窯址亦屢次出土了於器底心刻「盈」款的標本(圖 82)[91]，故學界均接受上述「盈」款白瓷應是來自邢窯所燒製。其中，易縣孫少矩墓除了「盈」款白瓷注壺之一，另伴出了施罩低溫鉛釉的喇叭式口貼花飾壺和瓣口細長頸圓腹壺[92]，後者器形與沉船菱形花葉飾大型把壺壺體有共通之處，至於與前者貼花飾壺裝飾技法類似的白瓷標本於邢窯窯址亦曾出土[93]。這就不排除同墓出土的晚唐鉛釉陶或有可能如盈款白瓷水注般，亦來自邢窯所燒製？無庸諱言，以上的作品外觀比較，至多只能做為白釉綠彩陶產地釐測時的間接提示，但可確認的是，認為白釉綠彩陶係鞏縣窯製品的說法同樣不足以令人信服。就如鞏縣窯白瓷般，邢窯系白瓷於揚州等地遺址也是和白釉綠彩陶共伴出土。我們應如何看待部分邢窯白瓷與白釉綠彩陶器形相近這一現象呢？沉船盈款綠釉陶是否可做為判別該類作品產地的依據？另外，據說河北井陘窯於晚唐時期可能曾燒製類似作風的鉛釉多彩陶器[94]，或許河北地區窯場才是今後

古與文物》1997 年 6 期，頁 7。

[88]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西安唐城工作隊(安家瑤)，〈唐長安西明寺遺址發掘簡報〉，《考古》1990 年 1 期，圖版柒之 3。

[89] 王長啟，〈西安市出土“翰林”、“盈”字款邢窯白瓷罐〉，《文物》2002 年 4 期，頁 83-84。以及畢南海，同註(44)，頁 13。

[90]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永士)，〈河北易縣北韓村唐墓〉，《文物》1988 年 4 期，頁 67 圖 3 之 1。另外，「盈」款白瓷最晚的紀年實例見於內蒙會同五年(942 年)耶律羽之墓，報告參見：內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等(齊曉光等)，〈遼耶律羽之墓發掘簡報〉，《文物》1996 年 1 期，頁 24 圖 48 之 8。

[91] 內丘縣文物保管所(賈忠敏等)，同註(9)，圖版貳之 7。

[92]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石永士)，同註(90)，頁 67 圖 2 及圖 3 之 2。

[93] 楊文山，〈邢窯“精細透光白瓷”的初步研究〉，《文物春秋》1997 年增刊(總 38 期)，頁 17 圖 4 之 3。

[94]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等(孟繁峰等)，〈河北井陘顯聖寺瓦窯、琉璃窯清理簡報〉，《文物季刊》1997 年 2 期，頁 21；孟繁峰等，〈河北瓷窯考古的幾個問題〉，收入：張忠培等編，《中國考古學跨世紀的回顧與前瞻》(北京：科學出版社，2000)，頁 368。另外，陳銀鳳等，〈正定縣收藏的幾件井陘窯瓷器〉，《文物春秋》2000 年 2 期，頁 52 則據此線索將正定縣出土的這類彩釉陶器列入井陘窯作品。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探索白釉綠彩陶正確產地的優先選擇。

另一方面，沉船所見各式白釉綠彩盃類也是一群饒富趣味的作品。其中一類是以敞口、斜弧壁、折腰的盃身為基本的器形，有的於盃身下方置圈足，盃上方口沿部位另設一泥條雙股式環形把，把上另安如意雲頭形印花[illegible](圖 83)，[illegible]上印花紋飾和把的造型與陝西南里王村 132 號唐墓出土的低溫三彩釉小注壺肩腹所安帶[illegible]把手完全一致[95]，應屬同一窯場所生產。其次，安徽省淮北市濉溪縣柳孜運河遺跡和山西省長治市南街爐坊巷遺址均出土了和黑石號作品頗為類似的於白釉上施加綠、褐兩彩的彩釉陶盆[96]，特別是前者柳孜通濟渠運河遺跡出土標本可說明揚州地區類似作品有的即是經由漕運自北方運來的。不過，最引人留意的盃式，無疑是在上述圈足盃下方置喇叭形足的高足盃了。該類盃可大致區分為二型，I 型盃身下方置竹節式柄，盃內心貼飾龍或魚(圖 84-a、b)，II 型盃盃心鑿小孔，上方分別貼飾龜、水鴨(圖 85-a、b、c)或魚(圖 86-a、b、c)等捏塑，盃外壁貼塑泥條狀中空管，管口外折略高於盃口，管下方順沿盃身下腹黏接於高足上方一側，並與盃心鑿孔相通，故可由管口直接吸飲盃內的液體，構思極為巧妙。類似構造的吸飲盃以往極為少見，但法國吉美(Mus'ee Guimet)博物館則收藏一件造型構思相同且於盃心貼塑水鴨的綠釉陶盃(圖 87)[97]。其次，揚州教育學院出土的被定為唐代鞏縣窯綠釉陶的所謂吸水杯[98]，恐怕亦屬同一器式，可惜因報告書未能揭載圖版，詳情不明。宋代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曾提到名為鼻飲盃的陶器，是於「梡碗旁植一小管若鈒觜，以鼻就管吸酒漿，暑以飲水，云水自鼻入咽，快不可言」[99]，其設計構思與沉船白釉綠彩陶如出一轍，故可做為白釉綠彩吸飲盃使用方式的參考資料。另外，伊拉

---

[95] [illegible]安志，同註(45)，頁 48 圖 2 之 2。清楚圖版另可參見：香港區域市政局，《物華天寶》(香港：香港區域市政局等，1993)，頁 78 圖 44。

[96] 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淮北柳孜－運河遺址發掘報告》(北京：科學出版社，2002)，彩版 30 之 3；長治市博物館(張斌宏等)，〈長治爐坊巷古遺址調查〉，《文物世界》2001 年 3 期，頁 46 圖 5。

[97] 此係筆者實見攝影。

[98] 揚州博物館(吳煒等)，〈揚州教育學院內發現唐代遺跡和遺物〉，《考古》1990 年 4 期，頁 343。

[99] (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收入：文淵閣四庫全書 589 冊，史部 347 地理類，頁 375。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克薩馬拉遺址亦曾發現相同構造的白釉綠彩陶殘片(圖 88)[9]，但或許由於殘片過小，而前述吉美博物館的藏品似乎又未為學界所熟知，以致於被誤認成瓶或水注殘件[10]。就此而言，黑石號沉船數件造型完整的吸飲盃將可再次豐富學界的視野，同時也透露出這類盃式主要可能是用來外銷，故除了揚州這一貿易港口之外，目前未見於中國其他地區遺址。

黑石號沉船的另一重要發現是打撈出了三件器形完整的白釉鈷藍彩器。其中一件為弧壁圓盤，餘二件造型呈口沿略外卷的折腰式盤，盤內壁有對稱分布的四道突棱。以上三件作品盤面藍彩紋樣各不相同，但均是以菱形花葉為基本構圖，並於內外壁近口沿處飾葉形紋(圖 89、90、91)。這類白釉鈷藍彩瓷早在七十年代揚州唐城遺址即曾出土(圖 92)[11]，此後於同地區三元路工地[12]或文化宮唐代建築基址[13]等遺跡亦陸續有所發現，從其經常是和白釉綠彩陶、長沙窯、越窯以及邢窯或鞏縣窯白瓷共伴出土一事可知，其時代應和上述瓷窯作品的年代大致相當。不過，對於其是否屬確屬釉下彩繪，則有不同的見解。相對於多數學者都主張其應是釉下青花瓷，遺址發掘者之一顧風卻數次撰文認為揚州出土的這類藍彩器可能是採用釉上彩繪的技法，非釉下著彩[14]。依據我個人觀察沉船該類作品的初步理解，是贊同顧氏的意見，認為其可能是先在器坏施掛白化妝並上釉後，才於釉上進行鈷藍彩繪。然而，我們更應尊重科學工作者以儀器檢測後所得出的釉下彩繪，即釉下青花的結論[15]。與此同時，從肉眼觀察所見藍彩於釉面部位呈色較深，以下逐漸轉淡的現象，似乎顯示了該類所謂唐青花瓷的彩繪工藝是不同於後世青花瓷器上的典型釉下彩飾。有趣的是，長

---

[9] 佐佐木達夫，〈1911-1913 年發掘サマラ出土陶磁器分類〉，《金[illegible]大學考古學紀要》22 號(1995)，頁 154 fig.33 之 342，F. Sarre 編號 839。另，Jessica Rawson 等，同註(76)，頁 59 圖 23。

[10] 佐佐木達夫，同上註，頁 115 認為是瓶殘片；弓場紀知，同註(58)，頁 96 稱水注形器。

[11] 南京博物院發掘工作隊等，同註(56)，圖版貳 1。

[12] 顧風等，〈揚州新出土兩件唐代青花瓷碗殘片〉，《文物》1985 年 10 期，頁 77-80。

[13]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揚州城考古隊等(王勤金)，同註(57)，頁 417 圖四之 14。

[14] 顧風，〈揚州新發現的早期青花瓷片的斷代及其燒造工藝的初步研究〉，《揚州師院學報》(社會科學版)1984 年 2 期，頁 81-85；及同註(103)，頁 77-80。

[15] 陳堯成等，〈唐代青花瓷器及其色料來源研究〉，《考古》1996 年 9 期，頁 81-87 轉頁 9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沙窯的釉下彩繪也是屬於非典型的釉下彩[99]。繼八十年代馮先銘依據胎釉等外觀特徵認為香港大學馮平山博物館收藏的一件同類白釉藍彩器可能來自唐代鞏縣窯所燒造後[100]，揚州出土的青花瓷標本亦經多次化驗，証實其產地應在鞏縣窯[101]。而如前所述，鞏縣窯白瓷也是揚州唐代遺址常見的器類之一。另一方面，黑石號沉船除見有青花瓷之外，另包括部分胎釉特徵和底足[102]修方式等均與青花瓷極為類似的白瓷作品(圖 93)，該類作品既見於揚州遺址，也曾見於薩馬拉或泰國南部等地遺跡，後二者遺跡出土標本經化驗分析，結論認為極可能來自鞏縣窯[103]。若結合鞏縣窯窯址發現有與沉船白瓷造型一致的四花口碗[104]，可以推測沉船同式碗亦應燒製於鞏縣窯。

四、黑石號沉船的航路及其所反映的晚唐貿易瓷商圈

黑石號沉船的發現地點位於蘇門答臘(Sumatera)東南海域，距勿里洞島不及兩哩之處，而就唐宋時代的航路看來，蘇門答臘東南部正是當時海上強國室利佛逝國的所在地，其北控馬六甲海峽，南扼巽地海峽等兩條往來東西方的必經水道，是七至十三世紀南海交通的總樞紐。著名僧人義淨即於咸亨二年(671 年)自廣州便乘波斯船南行抵室利佛逝，在佛室國王的贊助之下搭乘國王船舶穿過馬六甲海峽，經羯茶(今馬來西亞吉打 Kedah 一帶)、裸人國(今尼古巴群島 Nicobar 一帶)，抵達印度恒河口的耽摩立底國(Tāmrlipti)。[105]其次，唐賈耽作於貞元年間(785-804 年)的所謂《廣州通海夷道》也著重地提到佛逝國，並以佛逝國做為計算各航程的基點，指出由佛逝國水行數日可抵訶陵國(今印尼爪

---

[99] 張福康，〈長沙窯彩瓷的研究〉，《硅酸鹽學報》14 卷 3 期(1986)，頁 339-346。

[100] 馮先銘，同註(66)，頁 8。

[101] 文化部文物局揚州培訓中心(張浦生等)，〈揚州新發現的唐代青花瓷片概述〉，《文物》1985 年 10 期，頁 71；羅宗真等，〈揚州唐城出土青花瓷的重要意義〉，收入：《中國古陶瓷研究》(北京：科學出版社，1987)，頁 123-127。以及陳堯成等，同註(106)，頁 83。

[102] 薩馬拉標本分析見：Jessica Rawson 等，同註(76)，頁 51。泰國南部林文波(Laem Pho)等遺址標本分析見：何翠媚等，〈タイ國南部のコ—カオ島とポ--岬遺址出土のいわゆる北方白磁產地推定〉，《東洋陶磁》28 (1997)，頁 117-120。

[103] 馮先銘，〈河南鞏縣古窯址調查記要〉，《文物》1959 年 3 期，頁 56 圖 3。

[104] 馮承鈞，《中國南洋交通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76 年版)，頁 47-49。姚楠等，《七海揚帆》(台北：台灣中華書局，1993)，頁 69-73。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哇)，向西出峽數日可至葛葛僧祇國(今不羅華爾群島 Brouwers 中一島)；晚迄宋人周去非《嶺外代答》也說「三佛齊國(佛逝國於九世紀中葉改稱三佛齊)在南海之中，諸蕃水道之要衝也。東自闍婆諸國，西自大食故臨諸國，無不由其境而入中國者」⑭，此均說明室利佛逝是中國和印度、阿拉伯、南海諸國交通的重要中繼站，故黑石號沉船發現於此一海域應非偶然漂流所致。

如前所述，黑石號沉船陶瓷主要包括長沙窯彩瓷、越窯青瓷、邢窯白瓷、鞏縣窯白瓷和青花瓷、廣東窯系青瓷，以及產地尚待確認的中國北方白釉綠彩陶等作品。一個值得留意的現象是，其瓷窯種類與賈耽所提及的室利佛逝、訶陵等航線據點出土的陶瓷有共通之處。如室利佛逝的中心蘇門答臘東南部巴鄰旁(Palembang)曾出土唐代的越窯、長沙窯、廣東窯系青瓷和華北地區的白瓷；爪哇島既於泗水(Surabara)發現越窯青瓷，於日惹(Jogjakarta)更出土了越窯、長沙窯、廣東窯系青釉和白釉綠彩陶⑮。其次，宋代文獻記載做為其時海上交通中站的三佛齊國(室利佛逝國)同時也是香料和葯材的重要產地和集散地⑯，而黑石號沉船也裝載有不少的香料材。目前雖乏資料得以明確說明黑石號沉船是否曾經一度停泊佛逝國進行交易，而後才於再度出航時失事沉沒，但從遺留於沉船的大量中國物資不難得知，該船仍未完成最終的交易即不幸遇難。無論如何，賈耽《廣州通海夷道》的航線對於我們復原、理解黑石號沉船原先預定航路和最終目的地有著重要的參考價值。依據學界針對《廣州通海夷道》航線及其與今日地名的比定考釋，其自馬六甲海峽至波斯灣的航線約略如下：即海峽的北岸是羅越國(今馬來西亞南端)，南岸是佛逝國(今蘇門答臘東南部)，由佛逝國東航四、五日到訶陵國(今爪哇)。由海峽西行三日到葛葛僧祇國(今馬六甲海峽南部不羅華爾群島 Brouwers 中的一島)，其北面有箇羅國(今吉打，馬來半島西岸)，箇羅國西有哥谷羅國(今克拉地峽西南方)。又從葛葛僧祇西航四、五日到勝鄧州(今蘇門答臘北部東海岸棉蘭之北日里 Deli 附近)，又西行五日到婆露國即(婆魯斯洲)，又六日到伽藍洲(今尼科巴群島)，又四日到師子國(今斯里蘭卡)，隔海百哩即南天竺(南印度)。由師子國西航四日到沒來國(今印度西南

⑭ 桑田六郎，〈三佛齊考〉，原載《台北帝國大學史學科研究年報》(1934)，收入：同氏，《南海東西交通史論考》(東京：汲古書院，1993)，頁 210 等。周中堅，〈室利佛逝－中古時期南海交通的總樞紐〉，《海交史研究》1986 年 1 期，頁 30-37。

⑮ 三上次男，同註(70)，頁 335-337。

⑯ 桑田六郎，同註(113)，頁 233-275 參照。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部奎隆 Quilon)，轉向西北經十餘小國到婆羅門(印度)西境。又西北二日到拔𠯿國(今印度孟買北布羅奇 Broach)，又十日到新頭河(今印度河)河口附近的提𠯿國(今巴基斯坦附近的提勃兒 Daibul)。從此再西航二十日經波斯灣到達提羅盧和國(今波斯灣頭阿巴丹 Abbadan 附近)。又西行一日至烏剌國(Al-Ubollah 今奧布蘭)，有弗利剌河(Fuhrat 今幼發拉底河)自大食國(即阿拉伯回教國)流來，由此河溯流二日到末羅國(今巴士拉 Basra)，此為大食國重鎮；再向西北可由陸路抵達大食國首都縛達城(今巴格達 Baghdad)(圖 94)。⑯

賈耽所記航站當中，位於今斯里蘭卡的師子國之曼泰(Mantai)港灣遺跡已經正式的考古發掘，該遺跡除出土有波斯陶器之外，亦見大量的晚唐時期長沙窯彩繪瓷、越窯青瓷、邢窯系白瓷、鞏縣窯系白瓷和因曾出於印尼加里曼丹東桑(Dusun)族居住地俗稱 Dusun ware 的大型青釉罐，以及白釉綠彩陶等作品⑰。其種類既和前述蘇門答臘東南部(佛逝國)、爪哇(訶陵國)遺跡所出晚唐陶瓷相近似，也和黑石號沉船陶瓷有共通之處。這一方面說明了上述陶瓷種類是九世紀前期中國輸往南海等地的基本組合，其出土地點也透露出《廣州通海夷道》於九世紀前期可能仍是中國航向南海或大食的主要航道之一。其次，斯里蘭卡以西，賈耽所記述的提𠯿國在今印度河口的提巴爾(Debal)⑱，一般都相信今巴基斯坦喀拉蚩(Karachi)以東的中世都市遺跡班勃盧(Banbhore)即提𠯿的所在地⑲。該遺跡出土晚唐陶瓷計有長沙窯彩繪碗、模印貼花褐斑飾注壺、越窯青瓷碗、北方窯系白瓷碗和所謂 Dusun ware 的青釉帶繫大罐等(圖 95)。雖然，後者之青釉大罐有時被視為是九至十一世紀時期越窯系作品⑳，不過從黑石號沉船彩繪碗多係裝盛於該類大罐之中(圖 96)，可知其年代有的可早自九世紀前

---

⑯ 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北京：商務印書館，1986)，頁 42-43；陳炎，《海上絲綢之路與中外文化交流》(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1996)，頁 84-85。

⑰ 三上次男，〈陶磁の道—スリランカを中心として--〉，《上智アジア史學》3 (1985)，頁 9-10。

⑱ 于豪亮，〈我國古代海上交通中幾個地名的考釋〉，《文物》1978 年 11 期，頁 77-78。

⑲ *Encyclopaedia of Islam* (New Ed. 1965) Vol. 2 188-189: *DAYBUL*；Mumtaz Husain Siud, Arab Period, Hyderabad, 417-27. 轉引自：家島彥一，〈インド洋におけるシーラーフ系商人の交易ネットワークと物品の流通〉，收入：田邊勝美等編，《深井晉司博士追悼シルクロード美術論集》(東京：吉川弘文館，1987)，頁 211。

⑳ 佐佐木達夫，同註(27)，頁 247。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期，但詳細的器式編年還有待日後的資料來解決。另從廣東地區部分瓷窯窯址曾經出土造型不完全一致，但胎釉特徵則和該類青釉大罐頗為近似的帶繫罐標本一事看來[117]，不排除這類做為陶瓷等商品外容器的青釉大罐有可能來自廣東地區瓷窯所燒製[118]。另一方面，以往學者屢次地強調指出，班勃魯(Banbhore)遺址所見陶瓷和波斯灣當時最負盛名的東洋貿易港尸羅夫(Siraf)遺址出土陶瓷的內容極為類似[119]。事實確是如此。位於賈耽所記自提[illegible]國航向提羅盧和國(今阿巴丹附近)之間必經航運據點的尸羅夫，自六十年代後期至七十年代初期已進行數次正式考古發掘，依據報告書的敘述及其所揭示的圖版，則該遺址除出土有大量的波斯陶器、越窯系青瓷、長沙窯注壺和彩繪碗、北方白瓷、廣東窯系青釉罐、缽等之外，另見有施罩低溫鉛釉的印花二彩盃等作品[120]。其中，越窯系青瓷包括有浙江東陽象塘窯類型的四花口碗[121]；廣東窯系作品當中亦見同省高明、四會或安舖港地區所燒造內底留有數處呈放射狀排列的方形墊燒痕跡，極具特色的青釉碗[122]。此外，從近年 Moira Tampoe 公布的資料還可得知，尸羅夫遺址亦出土了白釉綠彩陶器(圖 97)[123]。家島彥一曾依據西拉夫遺址出土的飾有堆花紋樣的波斯翡翠藍釉陶器之形態與班勃魯遺址、斯里蘭卡北西海岸曼泰遺址甚至中國福建福州五代後唐長興元年(930 年)劉華墓等出土的波斯陶器之間的一致性，進而結合八至十世紀尸羅夫商人的貿易網絡，指出上述遺址出土的這類可能燒製於西拉夫的藍釉陶器，應是經由尸羅夫系商人的貿易活動才得

---

[117] 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曾廣憶)，〈廣東新會官沖古代窯址〉，《考古》1963 年 4 期，頁 222 圖 4 之 8。薛劍虹，〈新會、鶴山古陶窯址初探〉，收入：Ho Chuimei ed. *Ancient Ceramic Kiln Technology in Asia*. Centre of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1990. P. 27, pl.3。

[118] 三上次男，同註(26)，頁 20 亦指出該類帶繫罐可能來自廣東瓷窯所生產。

[119] 佐佐木達夫，同註(27)，頁 251-252。

[120] Whitehouse, D. Excavation at Siraf, Fourth Interim Report, *IRAN*, Vol.IX (1971), Pl.VIII~IX; Fifth Interim Report, Vol.X (1972), Pl.X~XI；Chinese Stoneware from Siraf : the Earliest Finds, *South Asian Archaeology*, Noyes Press, New Jersey, 1993, Pl. 241-255.

[121] 三上次男，同註(26)，頁 12。

[122] 何翠媚，同註(3)，頁 164；廣東省文物管理委員會等編，《南海絲綢之路文物圖集》(廣東：廣東科技出版社，1991)，頁 59 圖上。

[123] Moria Tampoe, *Maritime Trade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B.A.R. International Series, 555, 1989, pp. 57-5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流傳⑪。該一指摘對於理解黑石號沉船原本預定航路至為相關，因此，我們有必要回頭省思參與沉船打撈的調查人員所提供的有關沉船構造之重要訊息。

依據 Michael Flecker 針對黑石號沉船殘骸的船體形狀、構造方式和建材種類等之分析考察，則沉船船體應是在阿拉伯或印度所建造，船身木料來自印度，同時船體構件連接不用鐵釘而是採用穿孔縫合的建造方式，也和中國傳統的船體構造大異其趣⑫。唐末劉恂《嶺表錄異》提到「賈人船不用鐵釘，只使怳榔鬚繫縛，以橄欖糖泥之，糖乾甚堅，入水如漆也」⑬，指的正是這類形態的船舶。這種於舷板穿孔，以椰子殼纖維搓製成的繩索繫縛船板，再充填樹脂或魚油使之牢固的所謂縫合船(Sewn-Plank Ship)，早在紀元前後已出現於印度洋西海域，而九世紀中期的伊斯蘭文獻則強調指出縫合船是尸羅夫船工擅長建造的構造特殊的船舶，九至十世紀尸羅夫和蘇哈拉(Suhar)是縫合船的製造中心⑭。這樣看來，黑石號沉船不僅有可能是由尸羅夫船工所建造，同時也不排除船東即是活躍於當時海上貿易圈的尸羅夫系商人；宋代文獻所載往來泉州的尸羅夫商人，亦是搭乘尸羅夫或尸羅夫人貿易居住地所建造的這類縫合船⑮。儘管尸羅夫位居東洋貿易港之重要位置要遲至九世紀中葉，故賈耽《廣州通海夷道》並未有尸羅夫港的記事。不過，九世紀中葉阿拉伯商人蘇萊曼(Solaīman)之《中國印度見聞錄》則提到：「貨物從巴士拉(Bassorah)、阿曼(Uman)以及其他地方運到尸羅夫(Siraf)，大部分中國船在此裝貨」⑯。文中所謂的「中國船」曾引起不少學者的疑惑而懷疑其指的應是航向東南亞、中國的伊斯蘭船⑰。無論如何，就如賈耽《廣州通海夷道》般，九世紀中葉商人蘇萊曼所記述的自尸羅夫

---

⑫ 家島彥一，同註(119)，頁 210-217。

⑪ Michael Flecker, A 9th century Arab or Indian Shipwreck in Indonesia : First Evidence of Direct Trade with China.（未刊稿，稿件是陳玉秀女士所提供，謹誌謝意）。

⑫ 桑原隲藏，〈波斯灣の東洋貿易港に就て〉，《史林》1 卷 3 號(1916)，頁 18；戴開元，〈廣東縫合木船初探〉，《海交史研究》5 期(1983)，頁 86-89。

⑬ 家島彥一，〈アラブ古代型縫合船 Sanbuk Zafari について〉，《アジア、アフリカ文化研究》13 (1977)，頁 186-188。

⑭ 家島彥一，同上註，頁 188。

⑮ 穆根來等譯，《中國印度見聞記》(北京：中華書局，1983)，頁 7。

⑯ 家島彥一，〈インド洋通商イエメン－南アラビアの Siraf 居留地－〉，《アジア、アフリカ言語文化研究》5 (1972)，頁 124。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以迄中國的航線，對於理解黑石號沉船的可能航路無疑亦具重要的參考價值。

依據蘇萊曼所記航道，則船自尸羅夫啟航經馬斯喀特(Musgat，今阿曼首都)、故臨(Koulam，今印度半島西南端，即賈耽所記沒來國)、朗迦婆魯斯島(Langabalous，今蘇門答臘北部西海岸，即賈耽所記婆露國)、箇羅國(Kalah，今馬來半島東岸吉打)、滿潮島(Tīyouman，今馬來半島東岸)、奔陀浪山(Pan-do-Uranga，今越南藩朗)、占婆(Tcampa，今越南中南部)、占不牢山(Tchams，占婆島)、中國門(Bad al-Sīn，今西沙群島諸暗礁)，最終抵達廣州。此一航線除了由馬斯喀特直接越洋赴故臨之行程，與《廣州通海夷道》自沒來國(故臨)駛往波斯灣係採取沿岸停泊的航程有所不同之外，其餘航路則大致相同。對於由中國載運物資赴波斯灣的商船而言，停靠沿岸各據點進行貿易應該是明智的抉擇，而前述巴基斯坦班勃魯遺跡出土的中國陶瓷則是此一商販方式下的結果。其次，南宋周去非《嶺外代答》說：「中國舶商欲往大食，必自故臨易小舟而往」(卷二，「故臨國」條)；而「大食國之來也，以小舟運而南行，至故臨國易大舟而東行」(卷三，「航海外夷」條)⑫。不過，以黑石號沉船船身長近二十公尺，形體未必巨大，恐怕還不至於需轉乘小舟往赴波斯。另一方面，無論是賈耽或蘇萊曼都是以廣州為航路的起始點或終站，而這是否就意謂著黑石號沉船是由廣州解纜出航的？眾所周知，廣州是當時與南海通交最為重要的港口、外國商販雲集於稱為「蕃坊」的僑居地，朝廷亦設有市舶使掌管對外貿易。更重要的是，黑石號沉船不僅出土了數百件的廣東瓷窯作品，數以萬計的長沙窯彩繪瓷碗和部分北方邢窯系白瓷亦是裝盛於推測可能是廣東地區瓷窯場所燒造的大型甕罐之中。因此，若說黑石號沉船是由廣州啟航出海，似乎也言之成理。然而，若從沉船陶瓷的組合情況看來，事實恐怕未必如此地單純。

如前所述，黑石號沉船陶瓷除了有部分來自廣東瓷窯所生產的作品之外，主要還包括有長沙窯、越窯、邢窯、鞏縣窯、北方白釉綠彩陶和數件波斯藍釉陶器。儘管廣東地區墓葬或遺址亦曾發現邢窯白瓷、越窯青瓷和長沙窯彩繪瓷，但其發現頻率低、數量小，只有長沙窯的件數相對較多，但估計亦不過十數件⑬，目前尚未見到鞏縣窯白瓷或白釉綠彩陶的正式考古出土報導，遑論青花

---

⑫ 桑原騭藏(馮攸譯)，《中國阿拉伯海上交通史》(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7 年史地叢書版)，頁 112。

⑬ 宋良璧，〈長沙銅官窯瓷器在廣東〉，收入：《中國古代陶瓷的外銷》(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88)，頁 41-42。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瓷器了。另一方面，同為唐代對外貿易據點之一的揚州陶瓷出土組合的情況則頗耐人尋味。姑且不論墓葬的零星出土資料，僅就居住遺址所反映的陶瓷組合而言，如揚州市文化宮唐代建築基址出土的三萬餘件陶瓷標本當中即涵蓋了長沙窯、越窯、邢窯、鞏縣窯、青花瓷、白釉綠彩陶和波斯陶器⑫，其種類幾乎囊括了黑石號沉船廣東瓷窯之外的全部品種，類似的出土陶瓷組合也見於三元路唐代羅城範圍內遺址，該遺址既出土有長沙窯、越窯、鞏縣窯、青花瓷和白釉綠彩陶⑬，同時出土了數以百計的波斯釉陶殘片⑭。就目前我所掌握的資料看來，波斯釉陶器於浙江寧波、福建福州、廣西容縣、桂林等地遺址雖亦曾出土，但均止於個別的少量發現⑮；白釉綠彩陶於南方地區除了安徽巢湖唐墓和淮北市柳孜運河遺跡之外⑯，目前也只見於揚州唐代遺址。不僅如此，經常與波斯釉陶、白釉綠彩陶共伴出土的唐代青花瓷更是僅見於揚州遺址的稀有器類。換言之，揚州唐代遺址以長沙窯彩繪瓷、越窯青瓷、邢窯系白瓷、鞏縣窯白瓷、青花瓷、白釉綠彩陶和波斯陶器的陶瓷組合是非比尋常的特殊事例，於中國唐代遺址中顯得極為突出，而這樣的共伴組合則又與黑石號沉船陶瓷完全一致。尤可注意的是，相對於長沙窯瓷於中國境內極少出土，揚州舊城區汶河路發掘的一處範圍僅十餘公尺的堆積，出土之可復原成完整器的長沙窯瓷達五百件，當中僅蓋盒一種即有百件之多，報告者認為該遺址既未見其他瓷窯作品，其發現地點又鄰近古河道，很可能是當時卸貨清倉時的殘器遺留，進而推測唐代揚州設有專營瓷器的店舖⑰。如前所述，黑石號沉船即是以長沙窯的數量最多，計六萬餘件，後者尚包括有獅、鳥等玩具置物(圖 98)，這類小瓷玩偶除曾見於長沙窯窯址之外，目前亦只發現於揚州唐代遺址(圖 99)　。　⑱

---

⑫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揚州城考古隊(王勤金)，同註(57)，頁 416-419。

⑬ 揚州博物館(馬富坤等)，〈揚州三元路工地考古調查〉，《文物》1985 年 10 期，頁 72-76。

⑭ 周長源等，〈揚州出土的古代波斯釉陶研究〉，《文物》1988 年 12 期，頁 60。

⑮ 何翠媚，同註(72)，頁 43-44。另外，寧波出土例參見：林士民，〈浙江寧波公園路唐宋子城遺址考古發掘獲重要成果〉，《中國文物報》593，(1998 年 4 月 12 日)第一版。

⑯ 巢湖地區文物管理所(張宏明)，同註(60)，頁 575；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等編，同註(96)參見。

⑰ 周長源，〈試論揚州藍天大廈工地出土的唐代長沙窯瓷器〉，收入：中國古陶瓷研究會 1994 年會論文集《東南文化》增刊 1 號，頁 65-69。

⑱ 南京博物館等發掘工作小組等，同註(56)，頁 25 圖 20。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新唐書・田神功傳》載神功兵至揚州，大食、波斯賈胡死者數千人，是八世紀中期揚州已群聚眾多的伊斯蘭教商人[144]，他們還開設名為「波斯店」的商舖經營珠寶等商貨[145]，而揚州文化宮中晚唐遺址則曾發現推測係胡商邸店的建築遺留，其不僅出土精美的白瓷、青瓷、青花瓷、波斯釉陶和玻璃瓶，屋內地面還散落著金塊[146]。有趣的是，黑石號沈船的文物當中即包括有少量的玻璃瓶(圖 100)和整落的金箔。因此，我認為黑石號沈船商貨主要應是獲自位於大運河和長江天然航道且聚集著南北物資的揚州，並由揚州出港的。問題是我們要如何來面對存在於沈船中的廣東瓷窯作品？阿拉伯地理學家伊本・胡爾達茲比赫(Ibn Khordâdhbeh，838-912 年)所著《道里邦國志》在記述通往中國之路順序提到的港口是魯金(Lūgīn，今越南河內一帶)、漢府(Khānfu，今廣州)、漢久(Khānju，杭州？)和剛突(Qāntū，江都)[147]，桑原騭藏認為後者之江都即揚州[148]。從沿岸停靠的港口看來，不排除黑石號沈船中的廣東陶瓷有可能是北上或南下時一度停靠廣州之際所取得。其次，從揚州市汶河路遺跡曾出土與黑石號沈船造型一致的推測是屬廣東窯系青釉四繫帶流罐一事看來(圖 101)[149]，或許揚州原本就預置有這類黑石號沈船用來裝盛白瓷盌類的廣東窯系青釉外容器。該類四繫帶流罐於伊朗尸羅夫(圖 102)[150]泰國南部林文波(Laem Pho)等遺址都有出土，何翠媚認為其應是珠江三角洲和雷州半島北西地區等廣東海岸青瓷窯場所燒製[151]。

如前所述，儘管黑石號沈船並未完成其最終的交易即失事沈沒，但我們仍

---

[144] 桑原騭藏，同註(135)，頁 21。

[145] (明)謝肇淛，《五雜俎》:「唐時揚州常有波斯胡店，太平廣記往往稱之」，(卷 12)，詳見：桑原騭藏，同註(135)，頁 22。

[146] 蔣忠義，〈唐代揚州城遺址〉，《中國考古年鑑 1991》(北京：文物出版社，1992)，頁 178；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等揚州城考古隊(王勤金)，同註(57)，頁 420。

[147] 宋峴譯注，《道里邦國志》(北京：中華書局，1991)，頁 71-72。

[148] 桑原騭藏(楊鍊譯)，《唐宋貿易港研究》漢譯世界名著甲編 488 (台北：台灣商務印書館，1966)，頁 76。

[149] 揚州博物館等編，《揚州古陶瓷》(北京：文物出版社，1996)，圖 48。

[150] Moria Tampoe，同註(127)，p. 307, No. 1321、1322。

[151] 何翠媚(田中和彥譯)，〈タイ南部・コーカオ島とポー岬出土の陶磁器〉，《貿易陶磁研究》11 (1991)，頁 62 及頁 78 圖 15 右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可經由沈船發現地點結合九世紀文獻的航線記錄，以及部分遺址出土的陶瓷和船體結構所反映的船籍等線索，假設性地推論沈船有可能是預定駛往波斯灣著名東洋貿易港尸羅夫。關於這點，我們還可借由伊拉克薩馬拉等遺址的考古發掘資料得到必要的檢証。眾所周知，尸羅夫系商人是以尸羅夫港為軸心掌控著包括西邊做為伊斯蘭世界經濟文化中心的巴格達(Baghdad)，和北側呼羅珊(Khurasan)地區的都城尼什布爾(Nishapur)等地的消費市場[151]。但因為底格里斯(Tigris)河口及其鄰近海面多為泥沙沖積而成的淺灘，故海船至尸羅夫港之後，其貨物均需改裝至吃水淺的小舟運往巴士拉(Basra)、巴格達(Baghdad)等方面[152]，這也就如前引九世紀商人蘇萊曼所說的包括巴士拉、阿曼(Oman)等地的貨物亦需先運到尸羅夫裝貨[153]。值得一提的是，位於巴格達北邊底格里斯河兩側的九世紀(836-892 年)阿拔斯朝首都薩馬拉即出土了越窯、邢窯、鞏縣窯、長沙窯、廣東窯和白釉綠彩陶等作品[154]；而阿曼蘇丹國海濱蘇哈爾城址也發現了唐代的越窯、邢窯、長沙窯和廣東瓷窯作品[155]。從上述兩處遺址出土中國陶瓷種類與尸羅夫港遺址所見陶瓷一致，同時考慮到波斯灣的水文地勢，可以認為其中國陶瓷應是自尸羅夫港轉送而來的。其次，尸羅夫港等地遺址所見唐代陶瓷與黑石號沈船作品極為近似一事，也說明了將東方載運歸來的物資集結於尸羅夫港而後轉運小舟的運輸方式，極可能是九世紀尸羅夫商船的慣用模式。儘管目前還缺乏足夠的資料得以對尸羅夫等遺址出土的唐代陶瓷進行細緻的編年，但從其有不少作品與黑石號沈船陶瓷完全一致，不難得知九世紀前期已有類似黑石號沈船般的東方貿易船頻繁地進出尸羅夫港。而包括陶瓷在內的東方物資往往還經由層層陸運販售至內陸，其中又以呼羅珊地區 Tahirid 朝(820-872 年)和 Saffarid 朝(867-903 年)首都尼什布爾遺址出土的陶瓷最為人們所熟知。該遺址除出土有越窯青瓷、長沙窯彩瓷、邢窯白瓷和鞏縣窯白瓷之外，亦出土

---

[151] 家島彥一，同註(119)，頁 203-204。

[152] 桑原騭藏，同註(130)，頁 14。

[153] 穆根來等譯，同註(133)，頁 7。

[154] Friedrich Sarre（佐佐達木夫譯），同註(67)，頁 224-233。另外，該遺址出土有少量長沙窯一事，係參見：佐佐木達夫，同註(100)，頁 115。

[155] Michéle Pirazzoli-t'serstevens（程存浩譯），〈阿曼蘇丹國蘇哈爾遺址出土的中國陶瓷〉，《海交史研究》1992 年 2 期，頁 100-11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了白釉綠彩陶⑭。後者白釉綠彩陶當中還包括一件於內底心貼飾模印龍紋的淺缽殘片(圖 103)，其造型和裝飾特徵既和揚州三元路所出同類標本完全一致(同圖 65)⑮，也和黑石號沈船作品極為相近(同圖 64)。相對於中國陶瓷的大量輸出，亦有部分施罩翡翠藍釉(Turquoise)的波斯陶器被攜入中國，其中又以揚州發現的數量最多。值得一提的是，黑石號沈船發現的兩件器形大體完整的波斯釉陶雙繫罐造型，一件呈直口粗長頸(圖 104)，另一件呈唇口細長頸(圖 105)，前者樣式特徵與揚州城南出土的施罩同類色釉的波斯釉陶相近(圖 106)⑯；而與後者同一形制的波斯陶器，則見於尸羅夫遺址(圖 107)⑰。尸羅夫遺址出土的波斯釉陶器曾經化學分析，得出結論認為其產地有可能是在尸羅夫或伊拉克的巴士拉(Basra)⑱。無論何者，這類波斯釉陶器極有可能是經由尸羅夫系商人對外貿易而輾轉流傳各地的⑲。就此而言，黑石號沈船的波斯陶器或許亦可視為尸羅夫和揚州貿易活動的有益線索之一？

五、結語

經由黑石號與揚州唐代遺址出土陶瓷的比較，我認為沉船陶瓷等主要物資有較大可能是於揚州完成裝載作業並由此解纜出航。如果該一推測無誤，則可補強以往部分研究者所主張唐代揚州設置有管理對外貿易的市舶使的論點。換言之，由於唐太和八年(834 年)《疾愈德音》雖然提到：「南海蕃舶，本以慕化而來，……其嶺南、福建及揚州蕃客，宜委節度觀察使常加存問，除舶腳、收市、進奉外，任其來往流通，自為交易，不得重加率稅」，但當中並未明確提

---

⑭ Wilkinson, C.K, *NISHAPUR: Pottery of the Early Islam Period*, New York, The Metropolitan Museum of. 1974, p. 258 fig. 1-17.

⑮ 揚州博物館(馬富坤等)，同註(138)，頁 73 圖 3、4；揚州博物館編，同註(149)，圖 36。

⑯ 周長源，〈揚州出土古代波斯釉陶器〉，《考古》1985 年 2 期，頁 152 圖 1 左；揚州博物館，同註(149)，圖 42。

⑰ Whitehouse, D. 同註(124), Fourth Interim Report, Pl.Xc. Site D (窯址)；Sixth Interim Report, Pl. XIIa. Site B (清真寺跡)。

⑱ 何翠媚，同註(72)，頁 37。

⑲ 家島彥一，同註(119)，頁 217 及同註(134)，頁 129。另外，註(119)一文提到文獻記載每年納貢給巴格達伊斯蘭教主的地方特產當中亦包括尸羅夫產的陶器。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及市舶使、司，同時文獻又乏外國商船逕赴揚州的記錄，致使學界對於唐代揚州是否設置有市舶使或市舶司這樣的官員和機構有所爭議[164]。因此，設若黑石號果真由揚州出港，將可以具體的考古例證來說明唐代揚州可能存在的市舶事務機關。

從《唐會要》載唐大曆十四年(779 年)發佈之禁制有「令王公百官及天下長吏，無得與人爭利，先於揚州置邸肆貿易者罷之」[165]，以及前述揚州舊城區發掘的推測是瓷器店舖卸貨清倉時所遺留的大量長沙窯器，不難想像揚州櫛比鱗次的商舖為黑石號沉船的物資取得提供了便捷的途徑。另一方面，我們應留意黑石號沉船兩件白釉綠彩陶盤銘記所透露出的相關訊息。白釉綠彩陶盤的銘記均是於施釉入窯燒造之前鐫刻於圈足底，其中一件刻記「進奉」(圖 108-a、b、c)，另一件則陰刻「盈」字款(同圖 81)。按唐代自開元年間(713-714 年)以來即設有「大盈」、「瓊林」兩個內藏庫供帝王宴私賞賜之用，前者主要收納錢帛綾絹諸物，後者收納有金銀錫器、綾錦器皿等雜物，除了各地土貢諸物之外，亦有地方官大舉收刮民間財貨以進奉之名遂天子之私[166]。因此，白釉綠彩陶等陶瓷上的「盈」和「進奉」銘刻，極有可能是表示貢奉至「大盈」內庫的貢瓷[167]。其次，沉船伴出土的一件銘文明記係乾元元年(758 年)鑄造於揚州揚子江心的百鍊銅鏡(圖 109-a、b)，雖不排除係就近購自揚州，但也有可能即文獻所載揚州貢給皇帝的著名「江心鏡」、「百鍊鏡」[168]。此外，沉船所見金器或銀鎏金等器皿或許亦具同樣的貢品性質，這從中國考古發掘出土的刻有某某官「進」、「進奉」等銘文的銀器或銀錠亦可得知唐代金銀的進奉之風[169]。

如前所述，白釉綠彩陶的產地有鞏縣窯等不同說法，但從部分作品的造型特徵，以及「盈」字款目前均見於邢窯系白瓷，故有理由推測其或是來自河北

---

[164] 朱江，〈唐代揚州市舶司的機構及其職能〉，《海交史研究》1988 年 1 期，頁 81-84；嚴仁，〈唐代揚州的市舶事務與“所由”〉，《海交史研究》1989 年 1 期，頁 57-59。

[165] 桑原𨫼藏，同註(148)，頁 128。

[166] 室永芳三，〈唐末內庫の存在形態について〉，《史淵》101 (1969)，頁 93-109。

[167] 謝明良，〈有關「官」和「新官」款白瓷官字涵義的幾個問題〉，《故宮學術季刊》5 卷 2 期(1987)，頁 11。

[168] 孔祥星，《中國古代銅鏡》(北京：文物出版社，1984)，頁 177-179。

[169] 盧兆蔭，〈從考古發現看唐代的金銀“進奉”之風〉，《考古》1982 年 2 期，頁 173-179。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邢窯系窯場所生產。唐李吉甫《元和郡縣志》載鞏縣窯曾於開元間貢白瓷器，宋歐陽修《新唐書》則載邢州鉅鹿郡土貢磁器，河南府土貢埏埴[illegible]、缶[166]。王永興認為《新唐書・地理志》所載土貢時間約是在長慶四年(824 年)或稍後，又可稱之為「長慶貢」[167]。由於內藏庫物還可經由賞賜、供軍、馬市等方式而流通[168]，故不排除裝載有寶曆二年(826 年)紀年長沙窯瓷的黑石號沈船中的「進奉」銘白釉綠彩陶，可能即長慶年間的貢品之一。文獻不乏唐代波斯、大食使節來華進獻的記錄[169]，但《資治通鑑》所載長慶四年(824 年)九月有波斯人李蘇沙進獻沈香亭材予敬宗修葺宮室，則可確定是乘船由海路而來[170]，黑石號所屬波斯商賈或許亦如李蘇沙般在進獻方物的同時，經由皇帝賞賜或與朝廷指派的「宮市使」進行交易等多種途徑[171]，獲致原本收納於大盈內庫中的器物，這從中國出土的「盈」款陶瓷並不限於宮廷遺跡一事亦可窺知其同時具有的商品性質。無論如何，從伊拉克薩馬拉遺跡出土之白釉綠彩陶或綠釉陶均只發現於教主大宮殿或後宮房舍，可知這類彩釉陶頗受伊斯蘭教主的青睞[172]。其次，十一世紀波斯歷史學家貝伊哈齊(Bayhaqi，995-1077 年)記述哈里發哈崙(Caliph Harun，786-806 年)在位間，呼羅珊總督阿里・本・愛薛(Ali b. isa)曾向巴格達的哈里發貢獻了二千件精美的日用瓷器，其中包括二十件(俄文本譯二百件)哈里發宮廷也從沒見過的「中國天子御用的瓷器」(Chini Faghfuri)[173]。雖然後者作品的具體面貌已不得而知，但「盈」和「進奉」銘陶瓷正是唐代皇帝的御用陶瓷之一。

---

[166] 王永興編，《隋唐五代經濟史料彙編校注》第一編下(北京：中華書局，1987)，頁 413、423、447、467。

[167] 王永興，〈唐代土貢資料繫年—唐代土貢研究之一〉，《北京大學學報》1982 年 4 期，頁 60-65 轉頁 59。

[168] 中村裕一，〈唐代內藏庫の變容—進奉を中心に—〉，《侍兼山論叢》4 (1971)，頁 160-162 表二。

[169] 方豪，《中西交通史》(台北：華岡出版有限公司，1953)，頁 133-138。

[170] 中村久四郎，〈唐時代の廣東〉(三)，《史學雜誌》28 篇 5 號(1917)，頁 491-492。

[171] 《資治通鑑》卷 235 貞元十三年(797)十二月條載：「先是，宮中市外間物，令官吏主之，隨給其值，比歲，以宦者為使，謂之宮市」。

[172] Friedrich Sarre，同註(67)，頁 230。

[173] 張廣達，《西域史地叢稿初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5)，頁 451。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儘管從黑石號的沈沒地點和文獻所記錄的航道，可以大致地復原黑石號沈船原本預定完成的航程。但應留意的是，從黑石號沈沒地點勿里洞島的地埋位置，以及蘇門答臘西南部 Bengkulu 遺跡據說亦曾出土唐代青瓷等看來[176]，亦不排除黑石號沈船原本或擬採行穿越巽地海峽(Selat Sunda)航行蘇門答臘南部的航線[177]，但此還有待日後進一步的資料來解決。另外，輸往波斯灣的唐代物資所採行航線亦不一而足，特別是如泰國南部 Ko Kho Khao 和 Laem Pho 遺址發現的唐代陶瓷[178]，或許有可能是採用自箇羅國(馬來半島西岸，今吉打)北上哥谷羅國(克拉地峽西南岸)，沿岸航行的路線。值得一提的是，泰國林文波等遺址出土的陶瓷與黑石號沈船及波斯灣沿岸等遺跡出土陶瓷種類頗為相近，其不僅見有波斯釉陶，且包括有長沙窯彩瓷、越窯青瓷、廣東窯系青瓷、邢窯系白瓷、鞏縣白瓷和白釉綠彩陶；越南惠安外島守島(Cu Lao Thu)也曾出土唐代白瓷、青瓷、長沙窯和伊斯蘭青釉陶器，[179]此再次表明上述陶瓷是九世紀中國輸往南海各國的基本組合。與此相對的，東北亞日本雖屢見長沙窯、越窯、邢窯系白瓷和波斯釉陶器，卻基本未見唐代廣東窯系作品。其次，九州福岡市柏原 M 遺跡既出土與薩馬拉遺址類似的晚唐多彩鉛釉陶和白釉綠彩陶(圖 110)[180]，著名的鴻臚館跡亦曾出土白釉綠彩陶[181]。此外，從平安朝文獻《經國集》收錄

---

[176] 三上次男，同註(70)，頁 338。

[177] 足立喜六曾經指出賈耽在提及訶陵國後，所說「又西出硤三日至葛葛僧祇國」之「硤」係指巽地海峽(Selat Sunda)，進而主張九世紀中國與印度海上主要航路是採用蘇門答臘島南部路線(參見同氏：〈九世紀に於ける蘇馬達島南の航路に關する研究〉，《史學雜誌》49 篇 4 號，頁 1-32；49 篇 5 號，頁 48-93，1938 年)。雖然，其地名的考釋頗多誤植而招致批判(參見：山本達郎，〈足立喜六氏の「九世紀に於ける蘇馬達島南の航路に關する研究」を讀む〉，《史學雜誌》49 篇 11 號，頁 75-91，1938 年)，但此一航線值得留意。

[178] 何翠媚(田中和彥譯)，同註(151)，頁 53-80。另外，何氏觀察到 Laem Pho 遺址出土中國陶瓷數量多，波斯陶器少見；相對的 Ko Kho Khao 遺址則波斯陶器量大而中國陶瓷少，進而推測商船需一度於 Laem Pho 靠岸，轉經陸路再由 Ko Kho Khao 出港。另外，近年青柳洋治，〈南海の陶磁貿易－西から東，東から西へ－〉，《季刊考古學》66 (1999)，頁 55 亦有類似的看法。我對於這樣迂迴的貨物轉運方式持保留的態度。

[179] 長谷部樂爾，〈陶磁器の東西交涉〉，《出光美術館館報》114 (2001)，頁 11。

[180] 山崎純男，〈福岡市柏原 M 遺跡出土の唐三彩〉，《九州考古學》58 (1983)，頁 4 圖 2。

[181] 福岡市教育委員會，《鴻臚館跡 4－平成四年度發掘調查概要報告－》福岡市埋藏文化財調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的〈和出雲太守茶歌〉之「起鞏縣垸商家盤」詩文內容，推測日本遺跡出土的白瓷當中應包括部分的鞏縣窯白瓷碗在內⑰。因此，就日本遺跡所見唐代陶瓷的種類組合以及中日交通航線看來，揚州無疑也是日方取得陶瓷等物資的重要據點之一，而主要從事南海貿易的廣州則和日本關係相對淡薄。

雖然唐代陶瓷的造型或裝飾曾受到金銀器的影響已是學界的常識，但黑石號沈船則以具體的共伴例證再次說明該一事實。如與沈船四曲銀杯或金杯(圖 111)相同的器形亦見於同船的越窯(同圖 34)和長沙窯(圖 112)；白釉綠彩四花口碗之造型及碗心的模印貼花飾(同圖 64)也和沈船的花式口銀碗一致(圖 113)，至於數量龐大的長沙窯注壺壺肩模印貼花上施以團扇形褐斑之裝飾意念，無疑也是意圖模倣銀器鎏金的效果。相對於初唐和盛唐時期陶瓷經常於器上裝飾倣金銀器捶揲的模印貼飾，中晚唐時期陶瓷除仍繼承此一裝飾技法之外，另出現了不少以刻劃技法勾勒紋樣的作品，而前述白釉綠彩陶等作品上的菱形花葉紋劃花圖樣(同圖 68)之原型，可能即來自盛唐三彩模印貼花的類似圖紋(圖 114)⑱，後者之祖型則又是來自金銀器的捶揲工藝⑲。從沈船金器當中包括有以鏨刻技法裝飾圖紋的作品，還可推測中晚唐陶瓷上的刻劃花技法或許也是得自金銀器飾的啟示，如沈船中帶陰刻紋樣的越窯青瓷四方花口碟(同圖 19)的器形和裝飾作風，就和沈船的金碟大體一致(圖 115)。其次，白釉綠彩陶的菱形花葉紋飾於北宋早期的鉛釉陶上亦可見到(圖 116)⑳，至於在器胎陰刻紋飾而後施單多彩鉛釉的所謂遼三彩，也有可能是承襲晚唐以來刻線紋鉛釉陶器的傳統進一步發展而來的。

另一方面，歷來有不少學者曾經指出刻線紋彩釉波斯陶器是受到唐三彩的

查報告書第 372 集(1994)，卷頭圖版 1 之(2)。

⑰ 謝明良，〈日本出土唐宋時代陶瓷及其有關問題〉，《故宮學術季刊》13 卷 4 期，(1996)頁 111。

⑱ 佐藤雅彥等編，《世界陶磁全集》11（東京：小學館，1976)，頁 135 圖 117。

⑲ 三上次男，〈唐三彩鳳首パルメット文の水注とその周邊〉，《國華》960（1973)，頁 5-10 及頁 8 插圖 3。

⑳ 內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李逸友)，〈和林格爾縣土城子古墓發掘簡介〉，《文物》1961 年 9 期，頁 1 圖 1。矢部良明認為該作品是五代至北宋初河北省以南窯場所生產。參見同氏：〈晚唐、五代の陶磁〉，收入：佐藤雅彥等編，《世界陶磁全集》11（東京：小學館，1976)，頁 288。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影響才出現的(圖 117)[187]。就目前波斯陶器的編年看來，該類刻線紋彩釉陶約始於十世紀[188]，由於薩馬拉遺址或估計是航向波斯灣的黑石號沈船均見刻線紋白釉綠彩陶，而盛唐三彩又幾乎未見以線刻技法勾勒具體圖紋的作品。因此，更正確的說法應該是，波斯刻線紋彩釉陶器乃是受到晚唐鉛釉陶器的啟示。此外，學界對於分別見於中國和波斯陶瓷的所謂夾耳罐之祖型來源亦存在著不同的見解[189]。中國製造的夾耳罐雖曾見於湖南長沙窯窯址[190]，其中，見於正式發掘報告書的廖家壩窯址地層已經擾亂，只能推測得知其相對年代是於晚唐咸通以後至五代(847-960 年)間。就此而言，九世紀前半黑石號沈船所出長沙窯青釉夾耳罐(圖 118)就顯得至為重要。由於波斯陶夾耳罐有不少飾有「虹彩」(luster)(圖 119)，而後者之年代約於九世紀末至十世紀[191]，故可推測波斯陶器夾耳罐可能是受到中國的影響。不過，就如黑石號沈船所見構思極為巧妙的長沙窯夾耳罐是中國前所未見的新器式，同時長沙窯燒製的帶流瓷燈採用盞唇搭柱的燃燈方式明顯又是受到外來燈具的影響[192]，因此也不排除長沙窯的陶工是心繫中近東地區銷售市場的品味好尚而創造出的罐式。

(本文部分內容原本是為可望於近期出版的英文版黑石號沈船調查報告書所撰寫的解說，承蒙沈船發掘單位的好意，在此略作增補先行以中文發表。)

(責任編輯：羅麗華)

---

[187] 三上次男，《ペルシア陶器》(東京：中央公論美術出版，1969)，頁 59。

[188] 佐佐木達夫，〈初期イスラム陶器の年代〉，《東洋陶磁學會會報》15 (1991)，頁 3。

[189] 謝明良，〈略談夾耳罐〉，《故宮文物月刊》184 (1998)，頁 16-31。

[190] 長沙市文化局文物組(蕭湘)，同註(25)，圖版伍之 8 (廖家壩出土)。此外，從長沙窯課題組編，《長沙窯》(北京：紫禁城出版社，1996)，頁 40 得知藍岸嘴和譚家山窯址亦出土了夾耳罐，藍岸嘴作品線圖參見同書頁 47 圖 45。

[191] 佐佐木達夫，同註(188)，頁 3；同註(100)，頁 78。

[192] 孫機，〈摩羯燈 --- 兼談與其相關的問題〉，《文物》1986 年 12 期，頁 76。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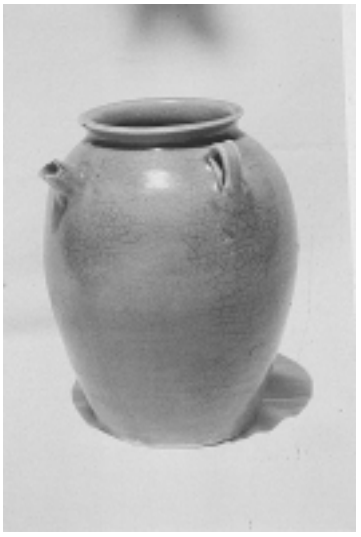


圖 1　廣東窯系青瓷雙繫帶流罐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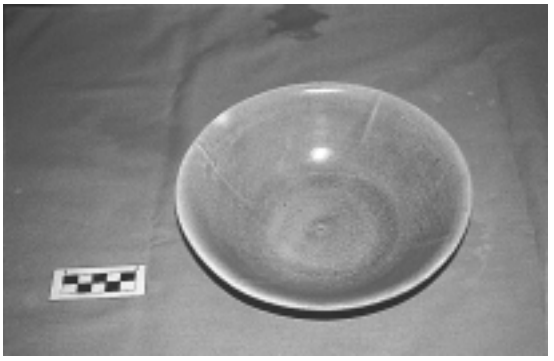


圖 2-a　廣東窯系青瓷四花口碗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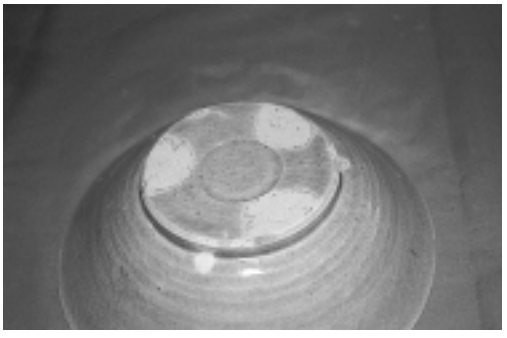


圖 2-b　同上底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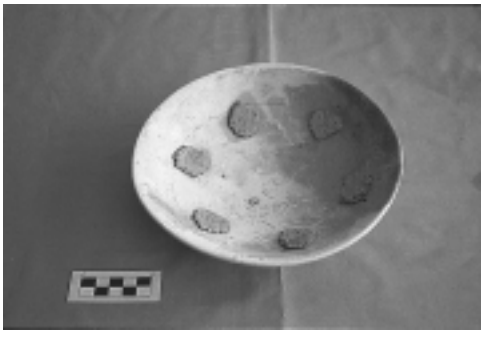


圖 3　廣東窯系青瓷寰底缽　黑石號



圖 4　廣東窯系青瓷碗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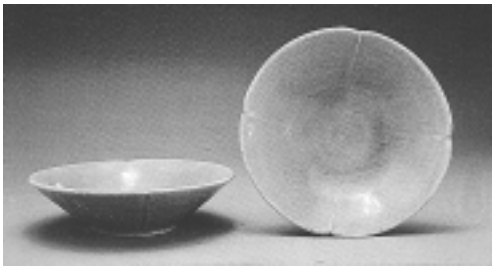


圖 5　青瓷四花口豌

廣東梅縣水車窯窯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6　邢窯系白瓷執壺　黑石號



圖 7　邢窯系白瓷碗　黑石號



圖 8　邢窯系玉璧形足白瓷碗　黑石號



圖 9　邢窯系白瓷杯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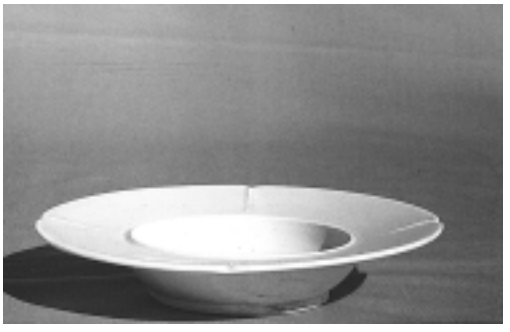


圖 10　邢窯系白瓷托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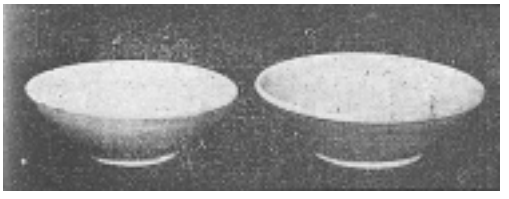


圖 11　邢窯系白瓷碗
廣州姚潭墓(858 年)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2　邢窯白瓷碗
河北臨城邢窯窯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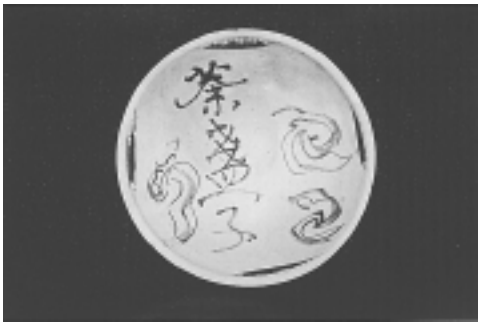


圖 13　長沙窯青瓷茶盞　黑石號



圖 14　長沙窯「開成三年」銘青瓷碗
東京國立博物館藏



圖 15　長沙窯貼花褐斑紋青瓷注壺
黑石號



圖 16　長沙窯青瓷小盂　黑石號



圖 17　長沙窯露胎青瓷碟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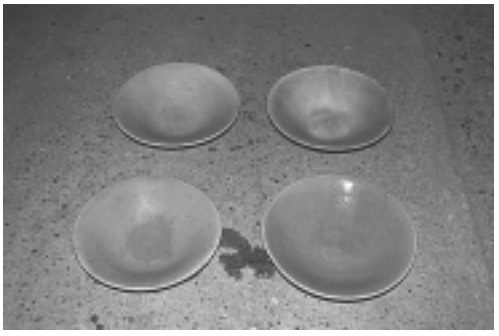


圖 18　越窯青瓷玉璧形足碗　黑石號



圖 19　越窯青瓷劃花四方碟　黑石號



圖 20　越窯青瓷唾壺　黑石號



圖 21　長沙窯青瓷碗　「寶曆二年」銘
黑石號



圖 22　長沙窯青瓷碗　黑石號



圖 23　長沙窯青瓷樹木紋碗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24　長沙窯青瓷花卉紋碗　黑石號



圖 25　長沙窯青瓷雲紋碗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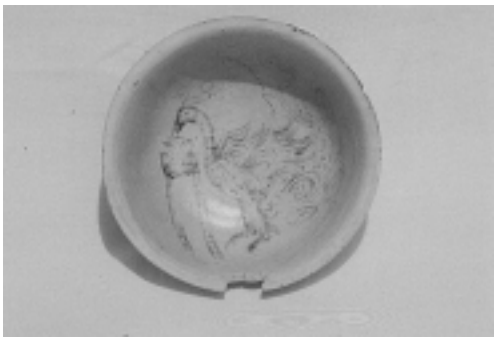


圖 26　長沙窯青瓷鳳鳥紋碗　黑石號



圖 27　長沙窯青瓷鳥啣綬帶紋碗　黑石號



圖 28　長沙窯青瓷摩羯魚紋碗　黑石號



圖 29　長沙窯青瓷卷髮人物紋碗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30　越窯青瓷劃花四花口碗　黑石號



圖 31　越窯青瓷執壺
黑石號



圖 32　越窯青瓷蓋盒　黑石號



圖 33　越窯青瓷劃花魚形穿帶壺
黑石號



圖 34　越窯青瓷四花口缽　黑石號



圖 35　越窯青瓷折沿盆
陝西扶風法門寺地宮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36　越窯青瓷鏤空薰盒
黑石號



圖 37　越窯青瓷帶繫盆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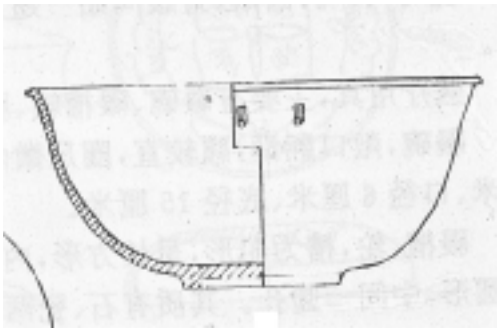


圖 38　越窯青瓷帶繫盆
浙江寧波和義路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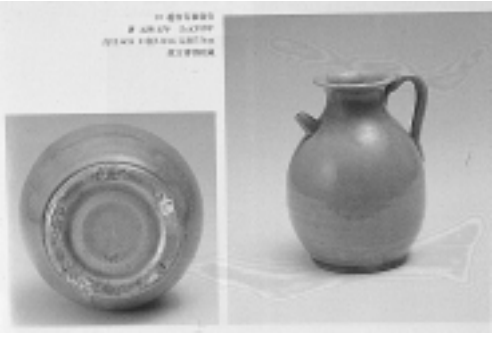


圖 39　越窯青瓷執壺
浙江紹興王叔文夫人(810 年)墓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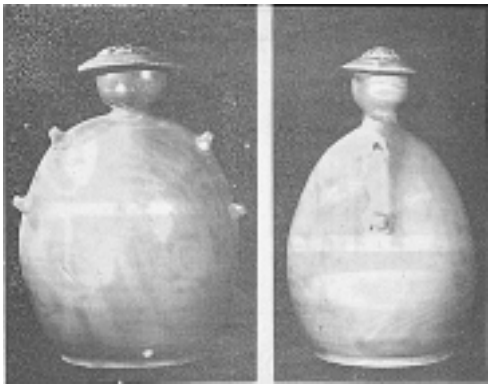


圖 40　越窯青瓷劃花穿帶壺
河南三門峽市張弘慶墓出土



圖 41　越窯青瓷劃花穿帶壺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42-a　白釉綠彩穿帶壺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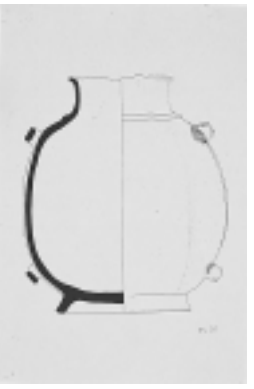


圖 42-b　同上　線繪圖



圖 43　邢窯系白瓷穿帶壺
黑石號



圖 44　邢窯系白瓷蓋罐
黑石號



圖 45　邢窯系白瓷帶流壺　黑石號



圖 46　白瓷蓋罐　河南鞏義市
薛府君(851 年)墓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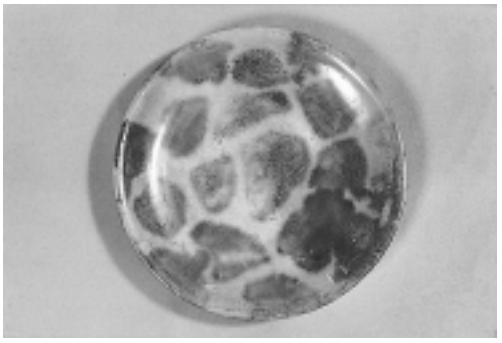


圖 47　白釉綠彩盤　黑石號



圖 48　白釉綠彩杯　黑石號



圖 49　綠釉執壺
黑石號



圖 50　白釉綠彩蓋罐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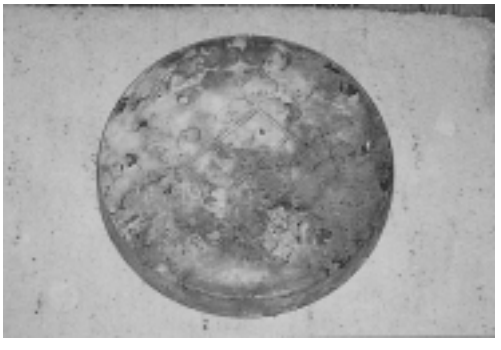


圖 51-a　白釉綠彩蓋盒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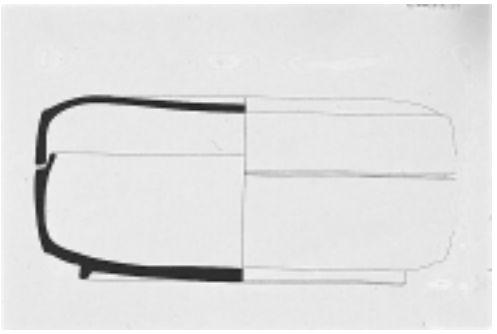


圖 51-b　同上　線繪圖



圖 51-c　同上　蓋面劃花紋飾



圖 52　白釉綠彩盃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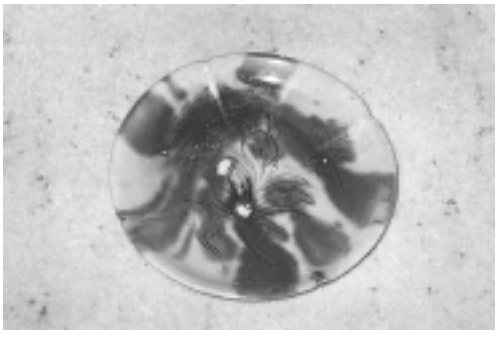


圖 53　白釉綠彩四花口盤　黑石號



圖 54　白釉綠彩碗　黑石號



圖 55　綠彩缽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56-a　白釉綠彩盆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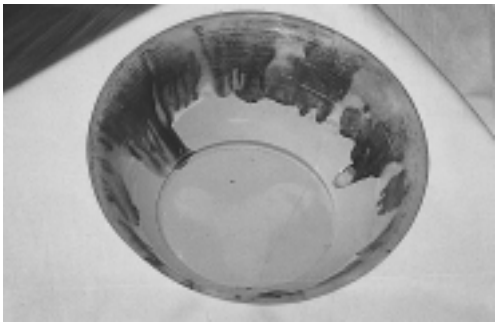


圖 56-b　盆底所見三叉支燒具痕跡



圖 57-a　白釉綠彩三足蓋盂　黑石號



圖 57-b　同上 線繪圖



圖 58-a　白釉綠彩執壺
黑石號



圖 58-b　同上 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59　白釉綠彩執壺
河南安陽薛家莊出土



圖 60　黃釉執壺　山西長治市
宋嘉進(792 年)墓出土



圖 61　白瓷執壺
西安白鹿原第 14 號唐墓出土



圖 62　白釉綠彩四花口碟
揚州唐城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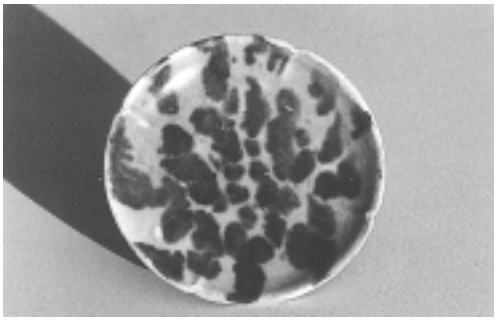


圖 63　白釉綠彩四花口碟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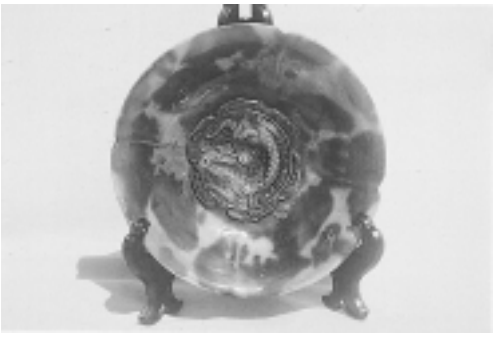


圖 64　白釉黃綠彩貼花龍紋碗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65　白釉黃綠彩貼花龍紋碗
揚州唐代遺址出土



圖 66　白釉綠彩盆
揚州唐代遺址出土



圖 67 白釉綠彩折沿盤
揚州唐代遺址出土



圖 68-a　白釉綠彩折沿盤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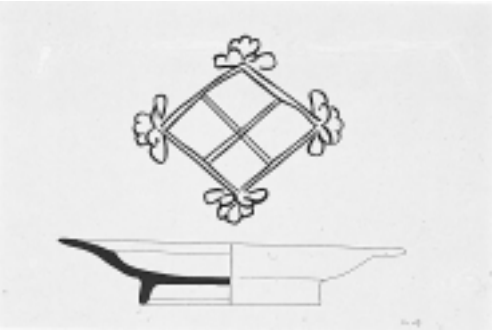


圖 68-b　同上　線繪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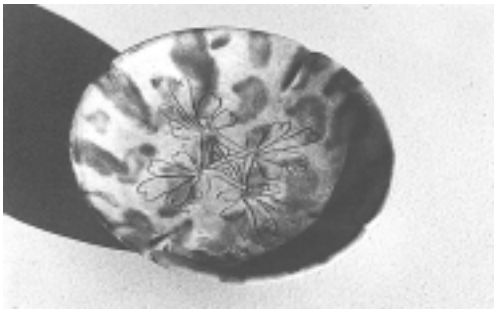


圖 69-a　白釉綠彩四花口碟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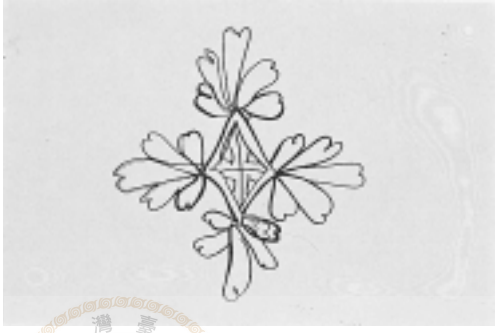


圖 69-b　同上　碟心劃花紋飾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70-a　白釉綠彩高足把壺
黑石號



圖 70-b　同上　壺身劃花紋飾(局部)



圖 71-a　綠釉龍首榫　黑石號



圖 71-b　白釉綠彩高足把壺和
綠釉龍首榫

臺灣大學學術
期刊資料庫



圖 72-a　白釉綠彩大罐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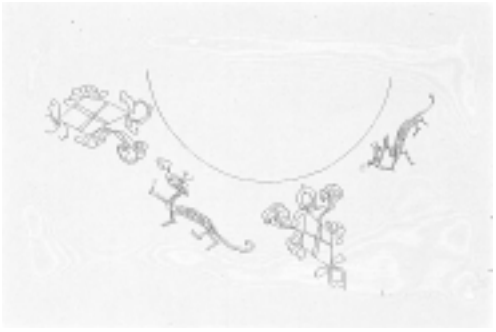


圖 72-b　同上　罐身陰刻紋飾



圖 73　波斯錫釉陶　9 世紀
Victoria and Albert Museum 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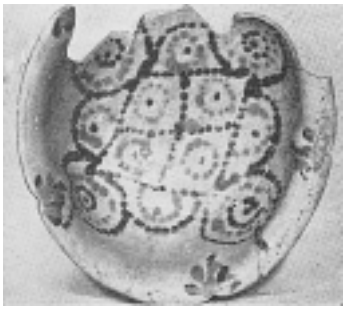


圖 74　長沙窯釉下彩繪碗
長沙窯窯址出土



圖 75　唐青花瓷片　揚州唐代遺址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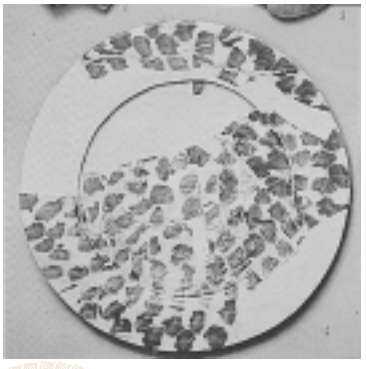


圖 76　白釉綠彩菱形花葉劃花紋折沿盤
伊拉克 Samarra 遺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77　白瓷執壺　台北私人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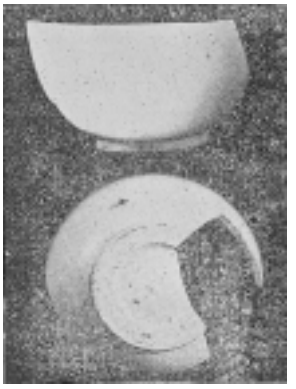


圖 78　邢窯白瓷碗
河北內丘邢窯窯址出土



圖 79　白釉綠彩碗　黑石號



圖 80　白釉綠彩碗所見玉璧形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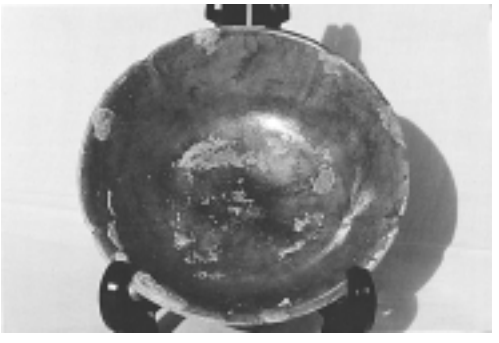


圖 81-a　綠釉花口碗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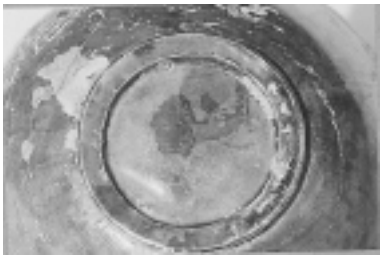


圖 81-b　同上　外底所見「盈」字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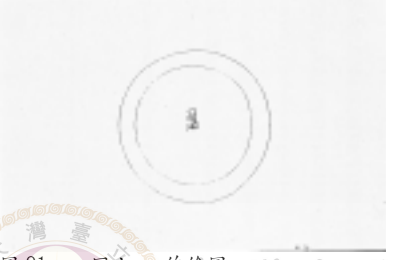


圖 81-c　同上　線繪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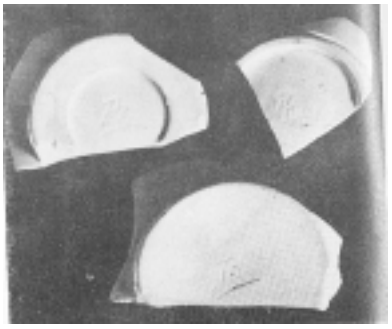


圖 82　邢窯白瓷「盈」字款殘片
河北內丘邢窯窯址出土



圖 83　白釉綠彩盃



圖 84-a　白釉綠彩盃高足盃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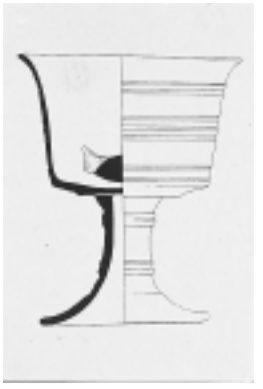


圖 84-b　同上　線繪圖



圖 85-a　白釉綠彩吸盃
黑石號



圖 85-b　同上



圖 85-c　同上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86-a　白釉綠彩吸盃　黑石號



圖 86-b　同上　俯視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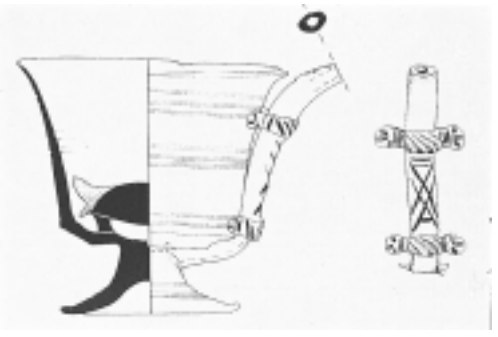


圖 86-c　同上　線繪圖



圖 87　綠釉吸盃
Guimet Museum 藏



圖 88　白釉綠彩吸盃殘件線繪圖
伊拉克 Samarra 遺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89　青花瓷盤　黑石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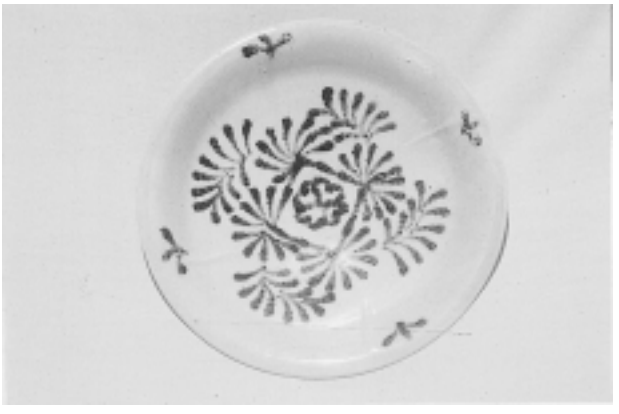


圖 90　青花瓷盤　黑石號



圖 91　青花瓷盤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92　青花瓷殘片　揚州唐代遺址出土



圖 93　鞏縣窯系白瓷碗　黑石號



圖 94　唐代和印度洋以西的海上交通線圖　取自章巽《我國古代的海上交通》



圖 95　青釉帶繫大罐　巴基斯坦 Banbhore 遺址出土



圖 96　青釉帶繫大罐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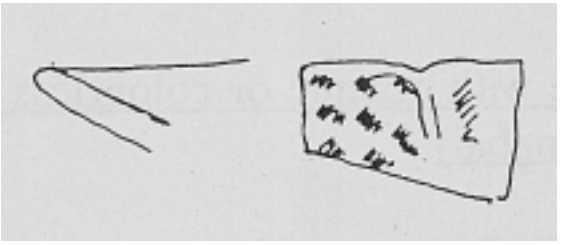


圖 97　白釉綠彩殘件線繪圖
伊朗 Siraf 遺址出土



圖 98　長沙窯青瓷犬
黑石號



圖 99　長沙窯醬釉瓷獅
揚州唐代遺址出土



圖 100　玻璃瓶　黑石號



圖 101　青瓷帶繫帶流罐　揚州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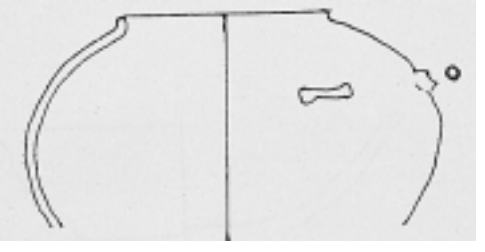


圖 102　青瓷帶繫帶流罐　伊朗 Siraf 遺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03　白釉綠彩碗碗心所見龍紋貼飾
伊朗 Nishapur 遺址出土



圖 104　波斯翡翠藍釉陶罐
黑石號



圖 105　波斯翡翠藍釉陶罐　黑石號



圖 106　波斯翡翠藍釉陶罐
揚州出土



圖 107　波斯釉陶罐
伊朗 Siraf 遺址出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08-a　白釉綠彩折沿盤　　黑石號



圖 108-b　同上　　外底「進奉」字銘



圖 108-c　同上　　線描圖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圖 109-a　八卦紋銅鏡　黑石號



圖 109-b　同上　局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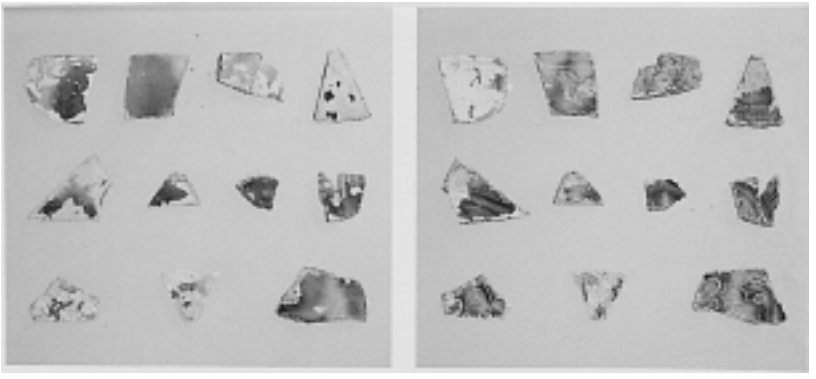


圖 110　晚唐多彩鉛釉陶和白釉綠彩陶殘片 日本福岡縣柏原 M 遺跡出土



圖 111　四花口金盃　黑石號



圖 112　長沙窯綠釉四花口盃　黑石號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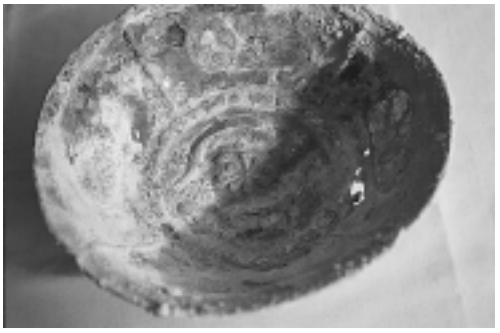


圖 113　鎏金銀碗　黑石號



圖 114　唐三彩鳳首把瓶　取自《世界陶磁全集》11 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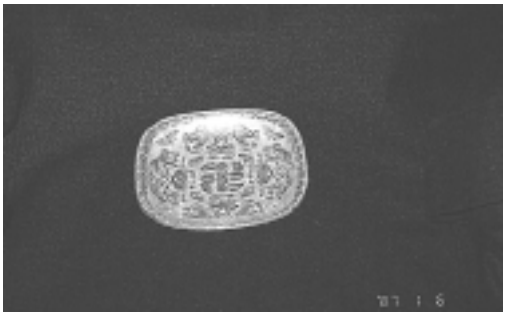


圖 115　四方金碟　黑石號



圖 116　褐釉盤口穿帶瓶　內蒙古和林格爾出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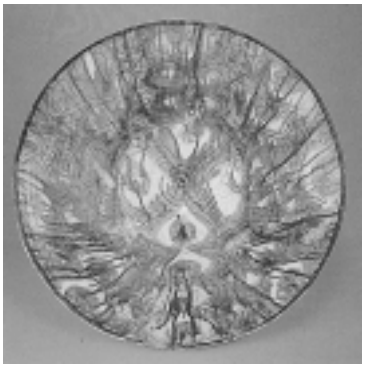


圖 117　波斯三彩劃花紋碗　取自《世界美術大全集》東洋篇 17 卷



圖 118　長沙窯青瓷夾耳罐　黑石號



圖 119　波斯虹彩夾耳罐　Chicago Art Institute 藏

臺灣大學學術期刊資料庫